



## 【论 文】

# 《消失的“国民”

## ——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序言（部分）<sup>1</sup>

王 柯<sup>2</sup>

本书为近年笔者以“民族”的视点观察“中国”社会，从“周边”的角度检讨“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系列中文书籍的第四部，前三部分分别为出版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1940年代》（2013年）、《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历史认识》（2015年）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2014年）。笔者之所以重视以“民族”的视点观察“中国”社会，从“周边”的角度检讨“中国”历史进程，不仅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开始于一个由来自“周边”的“异民族”统治的王朝时代的末期，针对“周边”的“异民族”的“民族革命”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转折点，“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也因此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主旋律，更是因为实现对“民族”和“周边”的统治，实为中国从古至今检验统治者是否具有统治正当性的、带有普世价值性质的重要标准。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谷风之什·北山）、“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入”（《礼记》礼运）是也，毋庸置疑，它是源自于“天下思想”的。其之所以能够成为普世的价值，是因为实现对“民族”和“周边”的统治被认为是“德治”的物化体现（objectify），“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荀子》议兵）即此意也。因此，笔者以为，以“民族”的视点观察“中国”社会，从“周边”的角度检讨“中国”历史进程，才能够真正体味“历史中国”的丰富意涵，从而看到今天“现代中国”的问题点。

不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向被统治者解释其统治的正当性。因此，从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大多的“中国人”其实就来自于历史上属于“周边”、属于“异民族”的集团；而“中华”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正是通过与“周边”和“异民族”的交往才得以造就的。正是因为历史上的“周边”和“异民族”的不断加入，“中国”和“中国人”形成了不断增大的趋势。这种历史趋势的形成，当然与“天下思想”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解释及其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历史趋势戛然而止，“异民族”和“周边”的离反，使“中国”在处理与“异民族”、与“周边”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一直不断地遇到严重的危机和挑战。其原因，与20世纪以后中国不得不顺从世界潮流从形式上放弃“天下思想”，而各个政权又积极走上一条自己所理解的建设“国民国家”（实为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道路有关。

对于近代以后、尤其是今天处于“周边”的“少数民族”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产生国家认同，有人说是因为对“少数民族”的不平等，而又有人说是因为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而带来的特殊感，其实揭开表面可以看出，这两种现象的问题性质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问题上，近代中国缺乏一种实践和真正实现“国民国家”的思想。近代的“国民国家”的

<sup>1</sup> 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一书的“序言”部分。

<sup>2</sup>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理想就是实现社会全体的平等、公平和公正，所以无论是“非国民”或是“超国民”，都是出于一种把“少数民族”视为“他者”（other）但是却又愿让它们自由脱离的思想。中华民国政权没有能够实现对“少数民族”的平等、公平和公正，甚至不肯承认“国民”一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难道不更是这样？处于以上基本考虑，本书希望从认同国家意识的形成与近代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解释、与近代社会关于传统文化的意识、与近代社会的社会流动性、与近代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与各个政权的政策决定因素等之间关系等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 20 世纪以来“周边”为何拒绝“中国”、“异民族”的集团为何抵制“中国人”意识？或者说他们为何不能或不愿成为中国的“国民”，他们的“中国人”意识是如何被消失或因何而消失的问题？

本书按照历史沿革，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在各个时期中的“少数民族”对中国建立国家认同问题上发生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除第九章之外，本书其他主要内容和章节都曾在各种学术场合发表过，但是为了更加精确地回答以上问题，此次收入本书时又结合笔者多年之思考，再次做了大幅度的修订。全书结构大致如下：

本书第一章、第二章从社会构造和文化系统之间关系的角度，考察传统中国促使具有不同于汉人的独特文化的民族集团对中国产生认同意识的原因。

第一章“从‘穆斯林’到‘中国人’——晋江陈埭丁氏宗族的‘本土化’过程”（原刊载于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现代中国研究》第 30 号，2012 年 3 月，第 1-27 页<sup>1</sup>），主要利用“族谱”等地方史数据，通过考察一个原本为穆斯林的群体是如何在中国南方农村社会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中逐渐转化为“中国人”的历史过程，研究传统中国能够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甚至是来源于不同“国家”的人们的社会机制，并从中发现国传统社会中保证平等和公平的社会流动的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平等和公平的社会流动在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之意义。第二章“‘回教’与‘回民’含义不同——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原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93 期，2005 年 12 月，第 96-105 页，原名《二重的忠诚——白寿彝和开封的故事》），以 1930 年代的白寿彝先生对“国家”和“民族”集团的“二重的忠诚”为例，通过考察中国文化古城开封对白寿彝思想形成的影响，分析 20 世纪上半期前中国社会中何以能够产生和保持多文化共存的空间，以及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文化个性的“民族”集团，能够区分个体的“民俗”文化和全体“国民”“共享”的政治文化，在其形成和保持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上的意义。

本书第三章、第四章从近代政治思想和政治过程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对“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对被视作“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所发生的影响。

第三章“‘汉奸’考——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话语”（原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第 83 期，2004 年 6 月，第 63-73 页，原名《“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其增补版刊载于日本岩波书店《思想》981 期，2006 年 1 月，第 28-47 页，原名“‘汉奸’考”），通过考察“汉”由一个文化共同体符号最后变成一个“民族”的符号、“汉奸”由一个满清王朝统治者用来表达与被统治者（汉）同属一个利益集团的词汇最后被改造为对外极端民族主义符号的历史过程，分析 20 世纪初期中国关于“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传统思想之所以发生衍变，以及步入近代之际将“汉民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切割的行为，与单一民族国家思想之关系。第四章“‘中华民族国家’的‘魅力’与‘凝聚力’——近代民族与近代国家的二重奏”（原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世纪中国》网络版，2003 年 7 月；后转载于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60 期，2010 年 1 月，第 1-8 页，原名《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通过考察 20 世纪初设计和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实践，进一步考察受到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影响

---

<sup>1</sup> 原名「中国南部ムスリム社会における「宗族」の成立と「漢化」——「陳埭回族」の事例を通じて」

的“中华民国”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对“国民国家”思想之理解，为什么影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形成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本书第五章、第六章分别考察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和取得政权之后的对少数民族政策，分析中共关于“国家”与“民族”关系思想之变迁，与其理解统治正当性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断裂的‘民族’话语——‘蒙古民族’问题与中共民族政策思想的历史过程”（原刊载于日本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月报》563号，1995年1月，第19-28页<sup>1</sup>），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出笼、变化和最后定型之过程与各个时期的“蒙古民族”问题之关系，分析中共决定对少数民族政策之原则，以及为何否定“国民国家”思想，并导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其夺取政权的正当性根据。第六章“从‘少数民族’到‘国民’？——1949年以后的民族政策过程”（原刊载于日本亚洲政经学会《亚洲研究》第47卷4号，2001年9月，第39-62页<sup>2</sup>），考察和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后民族政策的轨迹和分期，探讨其变化之规律和不同时期政策之性质，分析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的对少数民族政策给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可能带来的影响。

本书第七章、第八章主要根据笔者在中国南方的“回族”社会通过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实际考察几个南方“回族”小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中国政府在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上的变化给“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社会上以及对传统的认识上所带来的影响。

第七章“‘宗族’与‘民族’——‘民族化’的诱惑与挫折”（原刊载于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中国21》第34卷，2011年3月，第49-70页<sup>3</sup>），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福建泉州地区晋江市陈埭“丁氏回族”所经历的“再民族化”的过程为例，考察“少数民族”自身对“民族”符号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分析接受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和特殊待遇是否与获得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以及陈埭丁氏回族最终所选择道路的社会学意义。第八章“何处是‘传统’？——中国南方‘回族’社会的伊斯兰‘回归’”（原刊载于千叶商科大学，CUC View & Vision No. 41, 2016年3月，第24-28页<sup>4</sup>），从社会学的观点考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南方“回族”社会中出现的恢复“传统”的潮流，分析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所推动的恢复伊斯兰“传统”运动之兴起，与中国政府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之关系，并对比1930年代由伊斯兰精英所领导的恢复伊斯兰传统的实践，探讨将“想象”认定为“传统”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意义。

本书第九章“‘民族链’上的维吾尔——中亚突厥语系民族的历史文化意识与国民意识”，以1989年以后中国和中亚地区的政治过程以及世界伊斯兰教复兴浪潮为背景，运用“历史文化同心圆”和“民族链”的观点，动态地分析1989年以后再度掀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在一种跨越国界的人类生态和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与其他的“突厥语系伊斯兰民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互相刺激的“民族链”中，如何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无疑，“少数民族”是否能够建立和保持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如何才能让“少数民族”产生和保持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是20世纪中国在“民族问题”上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本章所提出的超越近代国家主权领域的历史文化同心圆和“民族链”的观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各个“民族”集团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sup>1</sup> 原名「モンゴル独立運動と中国共産党民族政策の成立」

<sup>2</sup> 原名「『少数民族』から『国民』への道程——現代中国における国民統合の視点から」

<sup>3</sup> 原名「経済開発と『民族』の役割の再発見——『陳埭回族』の事例を通じて」

<sup>4</sup> 原名「伝統」はどこまで遡れるものか——中国南方の「回族」社会におけるイスラームへの「回归」

## 【论 文】

# 从“勤王大清”到“满蒙独立”

——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运动”<sup>1</sup>

王 柯

当代日本研究中日关系的著名学者卫藤寅吉，曾经分析过明治后期以来日本社会关于中日关系认识的历史变迁过程：（1）出于对“唇亡齿寒”的担心，关心中国未来前途的日本人分为主张清国应该实施“攘夷”和主张清国应该实施“开国”两派，而最后清国开国派占了上风；（2）由于看到清国迟迟不肯放弃天朝体制，于是清国开国派又分为清国可能开国和清国不可能开国两派，而最后清国不可能开国派占了上风；（3）与其坐视锁国的清朝最终落入西方列强之手，不如由日本主动采取行动，于是不可能开国派再次分为支持征服中国和支持中国革命两派。<sup>2</sup>卫藤寅吉对近代中日关系历史走向的这一概括，代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观点，也确实点出了近代中日历史关系衍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特征。然而，从最初的与人为善的期待到最终采取不惜伤害对方的行动之间，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顺理成章的自然转移法则。很明显，这一观点同时有着成为替日本侵略中国进行辩护之口实的可能。原因在于它没有指出：支持征服中国或是支持中国革命两派的真正的分歧点，只是关于以何种手段才能为日本国家博得最大利益的认识上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的势力，之后甚至是当时也会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行为的原因。

支持中国革命与支持征服中国两派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手段的不同。如果从手段上对支持在中国扩大日本势力范围的日本人进行分类，其实还会更多的层次和选项。大正3（1913）年2月，研究中国的青柳笃恒在《太阳》第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我日本对支那之根本方针〉（上）一文中谈到：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日本社会中关于中国领土的舆论大致可以分为“分割论”、“吞并论”与“保全论”三种，而其中的“分割论”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将南满洲和内蒙古收入我手”，第二种为“将南满洲、内蒙古和黄河以北地区收入我日本之手”，第三种为“将南满洲、内蒙古、黄河以北之地及江苏浙江地区割让给我日本”。<sup>3</sup>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领土“分割论”，首当其冲被认为应该“收入日本之手”、或者直接割让给日本的地区都是“南满洲”与“内蒙古”，也就是所谓的“满蒙”地区。青柳笃恒的分析清楚证明，20世纪以来日本染指中国边疆地区的活动，大多始于“满蒙”、即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sup>4</sup>

说到日本对满洲产生侵略野心的渊源，一般都会提到佐藤信渊在其1823年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所提到的“所有经略他国之法，以从薄弱和易取之处开始为道。而于皇国而言，当今世界万国中最易攻取的土地非支那国的满洲莫属”一语。而近代日本对“满洲”产生直接关心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它开始侵略朝鲜半岛、也即开始侵略大陆之初。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与“满洲”分不开的战争，为日本提供了大陆国家化的坚实跳板。<sup>5</sup>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中日本就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领土要求。但是俄罗斯、德国与法国“三

<sup>1</sup> 本文为王柯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历史认识》的第五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137-192页）。

<sup>2</sup> 卫藤寅吉：〈大国におもねらず小国を侮らず〉《中央公論》，1972年10月號、118頁。

<sup>3</sup> 青柳篤恒：〈支那に對する我日本の根本方針〉（上），《太陽》第十九卷第三號，90-91頁。

<sup>4</sup> 因本文多用日文歷史資料和先行研究，為尊重原資料和加深讀者印象，以及文中行文方便起見，文中的「滿洲」即中國東北地區，「滿蒙」即東北與內蒙古東部地區。以下不再一一說明。

<sup>5</sup> 小林道彥：《日本的大陸政策—1895-1914》（東京：南窗社，1996年），7頁。

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将辽东半岛交还给清朝，然而1900年的“庚子事变”之后俄罗斯却占领了东北地区。“三国干涉还辽”带来的“屈辱”感，令日本对“满洲”地区的权益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才通过《朴茨茅斯合约》在“满洲”南部落下了脚跟，俄国将自己从清政府得到的旅大租借地、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及二者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了日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作为觊觎大陆领土的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话语，“满洲”却变成了“满蒙”。

这个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了清末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展开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问题：一个“民族国家”何以具有维持“天下”体制的合法性？1911年10月-11月间，梁启超在《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中就明确质问：“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中国如果从一个传统的多民族的帝国构造向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转型，“满”与“蒙”自然都是可以被“中华”所放弃的“鞑虏”。但是在这一时期，“满”与“蒙”之所以被能够合为一体，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日本势力的染指所造成。正如卫藤津吉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支持中国革命一派以外，还有部分日本人和日本政治势力为了扩张日本势力范围而参加了分裂中国的行动。本章研究的对象就是由大陆浪人川岛浪速教唆和推动的“满蒙独立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也同时参加了分裂中国的活动。

## 1. 川岛浪速与所谓“满蒙独立运动”的发生

出生于长野县的川岛浪速，在义和团事件（又称庚子事变）发生期间，随着他的同乡、当时被任命为日本临时派遣队司令官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著名情报军人福岛安正少将作为“通事”即翻译来到了北京。他借助于自己当年在兴亚会下外国语学校支那语科掌握的中文能力，在事变发生时成功地劝说了在紫禁城中2000余名清朝宫廷人员放弃笼城，因此得到了八国联军当局的信任。而被八国联军统治北京当局任命为皇宫总监的川岛浪速，又因保护紫禁城使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害，得到了清王朝的信任。之后，进入八国联军统治北京当局军政署警察部门的川岛浪速，藉助列强和日本军方的支持，在事变期间尽力维持了北京的治安，还参与设立了北京警务学校，因此在清皇室返回北京后，又被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用来说明建立现代警察制度。<sup>1</sup>当时，与川岛交好的肃亲王善耆为步军统领和民政部尚书。

尽管有人对“在北京政界中川岛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相当势力”一说表示出极大的怀疑，<sup>2</sup>但是毫无疑问，川岛浪速的确得到了清朝政府高层的极大信任。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够通过以下材料得到证明。1901年川岛希望回国度假，然而清朝政府的总理衙门居然向日本驻军提督山口素臣（第五师团长）发函，请求山口出面挽留：“该员自到京以来，办理一切事宜，善体帮教，悉臻妥恰，本爵极为欣慰。若一旦言旋，诸多未便，拟请贵军门转致该员，暂缓时日，再定归期，实于公务裨益良多，不胜殷盼之至。”<sup>3</sup>作为处理清王朝外交事务的最高机关，居然会为这样一件事发出专函请求，足见清朝政府对川岛浪速之重视。

下面这件事也可以证明川岛浪速在北京政界中的地位。1908年11月11日，川岛前往黄寺拜见来到北京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达赖喇嘛之间有过一段交谈：“（达赖说道）从前日本和商

<sup>1</sup>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全宗》，《聘請日本川島教練巡捕設立學堂每月需用月俸經費若干請將合同原定數目見復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1-14-022-01-005，光緒27年07月24日（1901年9月6日），發文人：步軍統領衙門。收文人：外務部。

<sup>2</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第112頁。

<sup>3</sup>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川島君在京辦理一切事宜悉臻妥洽請轉致暫緩回國由〉，光緒27年03月15日；1901-05-03，01-14-010-02-004。

有赴西藏者，我曾见过，今日又与君相见，也很喜欢。达赖问，君何时到京？川岛答：到了没有几天。达赖问：从日本到北京走几天？川岛答：多则十天，少则七八天。达赖问：君先后到北京几年？川岛答：在京共八年。达赖问：闻君从前在北京曾与喇嘛往来？从前在京见过喇嘛，与谈佛教，深蒙指教。达赖问：贵国大皇帝安否？地方安否？川岛答：托福，敝国大皇帝很康健，收成也好。达赖让茶并命堪布送川岛藏枣及苹果各一盘。川岛辞出携所赐藏枣苹果去。”<sup>1</sup>此次达赖喇嘛在北京停留了近三个月，但是能够见到达赖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为外交官僚并且屈指可数，而达赖喇嘛的随从罗桑旦增（堪布）却在川岛浪速前来拜见打来之前还亲自上门拜访了川岛浪速。<sup>2</sup>

川岛浪速曾经两次得到过清王朝的授勋。第一次是在光绪 28 年（1904 年，明治 36 年）12 月 15 日，“大日本国元陆军通译”川岛浪速获得了由清国“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颁发的“三等第二宝星”勋章；<sup>3</sup>第二次是在光绪 29 年（1904 年）12 月 4 日，“大日本国人警务学堂监督川岛浪速”再次得到“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颁发的“二等第二宝星”勋章。<sup>4</sup>可见，川岛浪速在与清朝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了清朝王公们的信赖。也正因为这种关系，企图在北京通过扶大厦于将倾的活动展示能力，以接近清朝皇族、借机为日本谋取利益的川岛浪速，很早就对野心家袁世凯抱有戒心。

按照《川岛浪速翁》一书的说法，在得知袁世凯被焦头烂额的清王朝重新启用之后，川岛浪速曾经三次组织了暗杀袁世凯的行动，企图将袁世凯杀害在从河南到北京就任的途中。其中两次还得到了在北京日本公使馆中日本陆军军官的支持，他们甚至直接参加了暗杀行动，但是却都没有取得成功。<sup>5</sup>1911 年 12 月 7 日，川岛浪速在从北京发给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的电报中谈到：“袁世凯阴谋逐渐膨胀，逼迫摄政王退位，欺负他人之寡妇孤儿，借太后垂帘之名垄断君权于一身。为盗取大清之天下，断朝廷之手足而植以自家羽翼，愈加示威于宫中、府中，毫无忌憚之处，遭到激烈反对。满人之愤懑已达其极。北京不日将化为祸乱之巷街，而其乱当自今日始也。”<sup>6</sup>川岛浪速笔下的袁世凯，一副活生生的小人得志猖狂的形象。这段文字，反映出川岛浪速对袁世凯借机要挟清朝皇室、逼迫皇室退位这一做法的强烈反感。然而这段话也反映出川岛浪速的立脚点，不是清朝而是清皇室。川岛浪速之所以站在清朝皇室的立场上，与他在北京得到清朝皇亲贵戚的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就认为，川岛“作为肃亲王等人的顾问得到非常信任。”<sup>7</sup>

为了对付袁世凯的步步进逼，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洵、铁良等一批满清权贵于 1912 年 1 月 12 日集会，1 月 19 日组织了“君主立宪维持会”（俗谓“宗社党”），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制政权，反对共和制。他们密谋驱除袁世凯，以毓朗、载洵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但是，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联系到同盟会，1 月 26 日同盟会彭家珍炸死了宗社党首领良弼，宗社党遂告鸟兽散。对于袁世凯回到北京以后的各种活动，川岛浪速早

<sup>1</sup> 《外務部全宗》西藏檔，〈日本人川島見達賴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2-16-007-02-044，光緒 34 年 10 月 18 日（1908 年 11 月 11 日）。

<sup>2</sup> 秦永章：〈1906—1908 年日本當局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接觸〉《民族研究》，2005 年第 4 期。

<sup>3</sup> 〈製鐵所長官陸軍中將中村雄次郎以下二十五名外國勳章並記章受領及佩用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10112575800，叙勳裁可書・明治三十六年・叙勳卷十・外國勳章受領及佩用四(国立公文書館)。

<sup>4</sup> 〈勳六等川島浪速以下三名外國勳章記章受領及佩用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10112590000，叙勳裁可書・明治三十七年・叙勳卷六・外國勳章受領及佩用三(国立公文書館)。

<sup>5</sup> 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116-120 頁。

<sup>6</sup> 〈受七六一，電報〉明治 44 年 12 月 6 日から（明治 44 年）12 月 9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24100，清国革命動亂ニ関スル情報 / 陸軍ノ部 第三卷(B-1-6-1-39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7</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 2 - 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1911 年 10 月 17 日

在1月22日给日本参谋本部发出的电报中，就已经直言这是袁和孙中山在演双簧戏。<sup>1</sup>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将中国大陆作为自己活动舞台的日本大陆浪人，基本上都对袁世凯十分仇恨。在这一点上，日本大陆浪人其实与革命党人非常接近。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日本浪人们对袁世凯的憎恨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憎恨二者完全等同。因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日本浪人之所以憎恨袁世凯，与其说是憎恨他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成果，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明白比起革命党人来，日本从狡诈的袁世凯处必将更加难以获得他们想在中国获得的利益。更有一部分日本大陆浪人，他们既不喜欢袁世凯也不喜欢革命派，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清王朝的统治体制下他们才能在中国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所以他们原本就没有接近过革命派，也不希望看到“革命”的发生，而对袁世凯的憎恨也是因为看到袁世凯已经成为了对清王朝统治体制的极大威胁，成为他们操纵和利用清王朝权贵的绊脚石，川岛浪速就属于后一种。

按照川岛浪速的说法，面对袁世凯的“老狻不忠”，清朝皇族中的醇亲王载沣（摄政王）恭亲王溥伟及肃亲王善耆开始密谋利用日本力量维护清王朝统治体制。与川岛浪速建立起了密切关系的肃亲王善耆，1912年1月22日晚亲自找到川岛商谈是否有得到日本的援助，藉助日本的力量逼迫袁世凯辞职离开北京的可能。<sup>2</sup>尽管东北地区的满族社会和以喀喇沁旗王为首的内蒙古东部蒙古王公表示愿意组织军队进行“勤王”，<sup>3</sup>川岛浪速也劝说日本军方向“蒙古勤王军”支持军火，<sup>4</sup>然而川岛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怎么做，清王朝都逃脱不了日益走向灭亡的命运，日本方面能够做到的也仅此而已。因此他在1月29日开始策划并规劝肃亲王等首先谋求将“满蒙”地区变成一个日后再起的根据地：“组织满蒙勤王军，通过标榜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祖先故土之理由保留大清之名义，暂以满蒙为根据地蓄养实力，静等民国自乱必有再出中原之时。宣统退位之罪在于奸臣和失去良心的王公们，可以替祖宗声讨此罪借此告知天下保存大清之名义。”他进而向日本说明这种做法的好处：“此一于北方兴起之国，其首脑当然明白只能靠日本的掩护才能生存。我国可以利用此点为我机关所用。所以应该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sup>5</sup>这应该是川岛浪速关于他策划的所谓“满蒙独立运动”构想的最早表述，但是可以看到，因为具有“勤王”的因素，直到此时还没有见到“独立”二字。

## 2. 蒙古王公的“勤王”与“独立”

1912年2月，在得知清王朝皇室已经决定逊位后，川岛马上开始行动，在川岛浪速的计划和具体安排之下肃亲王善耆于1912年2月2日逃出北京，由天津乘坐日本邮船渤海丸于6日到达了当时在日本控制之下的旅顺。<sup>6</sup>之后，川岛浪速又设计让在北京的蒙古王公逃离北京，以便回到内蒙古东部可以“举事”、“勤王”。

有趣的是，即使在1911年底和1912年初这个敏感的时点，被川岛浪速用来将“满”“蒙”两个民族集团的社会上层往一起糅合的历史和政治因素，仍然是即将谢幕的“大清”。包括清王朝在内，中国历史上由非汉族建立的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为主人公的征服王朝。这些王朝，因为在进入“中国”建立政权之后认识到无法用自己“民族”的统治方式统治“中国”，逐渐都

<sup>1</sup>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二号）同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1頁。

<sup>2</sup>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四号）一月二十三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2頁。

<sup>3</sup>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九号）同日、（第六一号）一月二十八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4-145頁。

<sup>4</sup>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九号）同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4頁。

<sup>5</sup>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二号）一月二十九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5頁。

<sup>6</sup> 波多野勝：《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74-77頁。

会向中华王朝转化。然而，由于这些政权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进入“中国”，最初都会与“中国”的民众之间存在严重的民族隔阂或民族对立，这使得它不得不在以中华文明方式统治“中国”的同时，又都采用了以周边的“民族”集团牵制“中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征服王朝的“多元式天下”的传统。<sup>1</sup>而在清王朝以民族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多元式天下”构造中，蒙古社会上层被赋予特殊的地位。所以，作为清王朝的一个特权阶层，在面临清王朝全面崩溃的时刻，蒙古社会上层也就对清王朝表示出了那么一点的“忠诚”。例如，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任陕甘总督的蒙古人升允率旧部反抗，他曾经做过这样一首诗以表明心态：“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苏武书。”<sup>2</sup>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由蒙古王公所提出的“勤王”——组织军队进军北京以说明清王朝支撑其统治体制，最初并不是出自于内蒙，而是出自于外蒙。1911年的11月8日（旧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了（外蒙古）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来信，内称：“现闻内地各省，相继独立。革命党人，已带兵取道张家口来库，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四部蒙众，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我佛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已传檄征调四盟骑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起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sup>3</sup>

外蒙古四盟王公在信中所提出的“勤王”条件——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事实上是当时库伦大臣所根本无法办到的。因为外蒙古王公已于一年前开始暗中交接俄国势力筹划独立，所以说，这封信中所提出的“勤王”，只不过是为其之后进行分裂活动制造一个正当性理由。果不其然，当天晚上7时，三多再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sup>4</sup>

不能“勤王”就要独立，从这种做法中可以看出蒙古王公们的一个逻辑：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大清国的臣民却不是中国的国民。因此，清王朝一旦灭亡，蒙古与清王朝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就随之烟消云散，而蒙古也就与中国没有了干系。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既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内地各省都可以与清朝政府脱离关系而实现独立，那么与各省同为大清国组成部分的蒙古，既然无法通过“勤王”的手段去保护作为母体的清王朝，那就只能与中国内地各省同样选择自保的方法，与清王朝脱离关系。然而，为什么即使勤王作为分裂的正当性根据值得引起注意。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开中国近代民族分裂活动之滥觞。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生，与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剧变，二者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而与当年清王朝采用“多元式天下”的思想构筑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而今革命家提倡和追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和行动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sup>5</sup>而蒙古王公之所以提出“勤王”遭拒为提出“独立”的正当性依据，还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正是因为以上关系，蒙古王公在意识到清王朝已经无法扭转灭亡之趋势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勤王”口号，实质上就是“民族独立”的前奏曲。口头上喊着“勤王”，实质上想的却是“民族独立”，内蒙古的王公们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活动，同样也是这种情形。不同的只是，内蒙古王公们的“勤王”得到了日本势力的支持，

<sup>1</sup>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五章〈多重的帝国与多元的帝国〉。

<sup>2</sup> 葛生能久：《东亜先覚志士记伝》中，（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5年），第306页。

<sup>3</sup> 傅启学：《六十年来的外蒙古》（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28页。

<sup>4</sup> 傅启学：《六十年来的外蒙古》（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29页。

<sup>5</sup> 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台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五章《多重的帝国与多元

而外蒙古的分裂活动具有帝俄的背景。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利用诸多档案，记述了这一时期在北京蒙古王公的活动特征。以那彦图（喀尔喀亲王、清廷御前大臣、八旗镶红旗都统）、贡桑诺尔布（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亲王、卓索图盟盟长、肃亲王善耆的妹夫）、博迪苏（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博德勒噶台亲王伯彦讷谟佑第三子、辅国公、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兼署正红旗满洲都统）、多尔济帕拉穆（喀尔喀车臣汗部中右旗札萨克多罗郡王、车臣汗部克鲁伦巴尔和屯盟盟长）、帕勒塔（土尔扈特东部落六世君王巴雅尔之生子，袭封札萨克郡王，科布多办事大臣）为首，当时在北京清廷中有二十几名蒙古王公。<sup>1</sup>此时这些蒙古王公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活动特征，一言蔽之，就是激烈反对清帝退位和实行共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为首，12月24日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又称“蒙古同乡联合会”、“旅京蒙古联合会”、“蒙古联合会”）。<sup>2</sup>12月26日以上述三人及多尔济帕拉穆为首，纠集其他24名蒙古王公，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向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递交信函，向清王朝示忠并要求袁不要与革命派妥协，并声称外蒙之所以宣布独立是因为担心实行民主制，“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sup>3</sup>还向日本公使馆表示：“若果真无法摆脱满朝灭亡、建立共和的命运，蒙古诸王族原本只与满廷相通，隶属于其，对于汉人组织之政府并无继续此种关系之义务。”<sup>4</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蒙古王公们在同时给南方代表伍廷芳的两封信中指责革命党人为“狭隘民族主义”，而他们所提出的之所以反对导入共和体制的理由在于：“满蒙藏回……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并且威胁说：“如诸君子固持己见，鹜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sup>5</sup>而在1912年1月17日至23日清廷召开的御前会议，之所以迟迟不能就接受共和、清帝退位达成统一意见，与会的蒙古王公的激烈反对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惟与清廷有血统上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sup>6</sup>

蒙古王公之所以敢于声称“血统关系”，是因为多年来清王朝一直实行“满蒙联姻”的政策。而川岛浪速敢于提出组织蒙古举兵“勤王”的根据。当然，川岛浪速之所以能够向肃亲王善耆等人提出“组织满蒙勤王军，通过标榜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祖先故土之理由保留大清之名义，暂以满蒙为根据地蓄养实力”的建议，既是他出于对清王朝内部政治构造的了解，也是他与当时清廷宗室、以及在清廷中蒙古王公之间建立起了相当程度的相互信赖关系的证明。因为是肃亲王善耆的妹夫，最为川岛浪速所重视的就是喀喇沁的贡桑诺尔布。

---

的帝国》。

<sup>1</sup>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sup>2</sup>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sup>3</sup>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中间立夫：《「满蒙问题」の歴史の构图》（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第132页。〈伊集院全権公使、内田外务大臣宛电报〉第七六〇号，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61600、清国革命动乱ノ际蒙古独立宣言并ニ清国政府ニ対シ行政ニ关スル要求一件(B-1-6-1-43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sup>4</sup> 〈伊集院全権公使、内田外务大臣宛电报〉第七二一号，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61600，清国革命动乱ノ际蒙古独立宣言并ニ清国政府ニ対シ行政ニ关スル要求一件(B-1-6-1-43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sup>5</sup>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

<sup>6</sup>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由于善耆的关系，贡桑诺尔布与川岛浪速也应该早有来往。1902年春，贡桑诺尔布接受日本秘密邀请，访问日本并到大阪参观“内国劝业博览会”。在此期间他与日本朝野多有接触，并与曾经担任日本临时派遣军司令官参与了镇压义和团的著名情报军人、当时的参谋次长福田安正之间就作为“日蒙亲善”的一环而在内蒙发展近代学校教育一事达成了协议。在归国途中，他又向日本驻清国公使内田康哉提出要在王府内设立女学堂，按照日本的方式进行女子教育，并拜托内田为其介绍教师。内田托人找到了当时在北京警务学堂担任教习的川岛浪速，于是川岛浪速就介绍了河原操子。福岛安正与河原之父河原忠以及川岛浪速皆为信州（今长野县）松元人，且为旧知。1903年12月河原操子离开北京前往喀喇沁时，川岛和当时的日本驻清国公使内田康哉、青木宣纯大佐为其送行，一直送到东直门外。<sup>1</sup>继毓正女学堂之后，贡桑诺尔布又设立了武备学堂，聘请日本陆军伊藤柳太郎少佐为教官，伊藤少佐并且带来了一到两名军官，三到四名士官。因为这种关系，内田康哉赞扬贡桑诺尔布为：“近年来蒙古王公中切实向本国求欢之第一人。”<sup>2</sup>而从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可以看到，自1905年起，贡桑诺尔布就曾经通过各种管道不断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秘密借款。<sup>3</sup>

为了支持贡桑诺尔布“举事”“勤王”，川岛浪速1911年12月通过福田安正参谋次长介绍横滨正金银行以“其全部领土为抵押”向贡桑诺尔布借款“两万两”。<sup>4</sup>1912年2月，为了建立“举兵的根据地”，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川岛浪速和日本驻清国公使馆武官高山公通大佐又向准备逃离北京返回喀喇沁的贡桑诺尔布提供了三万发子弹。贡桑诺尔布还通过川岛向大仓组借款20万日元，并为此立下了字据：“代表卓索图盟五旗因保卫地方期间，借到大日本帝国川岛浪速君名下日金二十万元，言明年利五厘，三年为限，本利归还，以卓索图盟内所有矿山作为抵押，若不能归还时，任川岛君随意开采，期内不许他人开办，至支用方法亦必向川岛君商明，以昭信受，立借字为证”。<sup>5</sup>为了促成这笔借款，川岛关于“卓索图盟内所有矿山”的详情向福田安正作了以下说明：“卓索图盟内矿山极多，大约数十至五十几座，仅喀喇沁旗下就有10座金山、三座银山、一座铜山、七座煤矿。”

在组织“勤王军”的实际行动上，因为有自己的民族根据地，“蒙古人”好像是走到了“满洲人”的前面。川岛浪速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蒙古人”本身也的确希望自己能够领先于“满洲”而起事。<sup>6</sup>贡桑诺尔布以及巴林王在松井清助大尉和木村直人大尉的分别陪同下，于1912年3月5日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喀喇沁和巴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贡桑诺尔布回到了喀喇沁后向其部下提出的目标却是“蒙古民族的独立”。<sup>7</sup>尽管日本抱着“将满蒙联合建设为一个王国”的“满蒙独立运动”之梦，但是中间认为贡桑诺尔布的行动说明，蒙古人的行动不过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而绝没有建设一个满蒙王国的意思。<sup>8</sup>

事实上，川岛浪速并非不知道蒙古王公的这些真实想法。因为他已经探知，在北京“不久前

<sup>1</sup> 波多野勝：《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第76-77頁。

<sup>2</sup> 〈機密第五五号、喀喇沁王貸金ニ関スル件〉《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000,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 蒙古ノ部(1-7-1-04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3</sup> 〈機密第五四号、漢公貸金ニ関スル件〉《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蒙古ノ部 喀喇沁漢公対正金銀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39900,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 蒙古ノ部(1-7-1-04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4</sup> 〈喀喇沁王横滨正金銀行へ借款申込ニ対シ在北京川島ヨリ意見具申併請訓〉《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 3.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300,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 蒙古ノ部(1-7-1-04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5</sup>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 4. 喀喇沁巴林借款(対大倉組)、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400,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 蒙古ノ部(1-7-1-04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6</sup>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 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6-147頁。

<sup>7</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62頁。

<sup>8</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43、151頁。

喀喇沁王和宾图王访问俄国代理公使，询问如果内蒙古独立时贵国可以提供何种程度的实际支持。”<sup>1</sup>换言之，蒙古人对组织军队上的热情，可能并不是完全为了进行“勤王”，最大的可能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的目的。他们对待日本的态度，其实也是应该在这个层次上被理解的。

### 3. 从“满洲”到“满蒙”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蒙古王公”藉以发动“勤王”之师的根据地都是邻接“满洲”的内蒙古东部地区。而这个地区，当时事实上也是被日本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地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虽然通过〈朴茨茅斯合约〉在“满洲”南部落下了脚跟，但对俄国却并不放心，为了确保到手的权益利权，就两国在“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与俄国进行交涉，两国于1907年签订第一次日俄协约，在协约案的《秘密协约》中决定将东经122度以东的东北地区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而根据铃木仁丽《满洲国与内蒙古—从满蒙政策到统治兴安省》的说法，日本对内蒙古东部产生领土野心，则是随着日俄两国就满洲的势力范围进行的秘密谈判才逐渐明确起来的。

1907年的第一次日俄协约时，附件的秘密协约决定在东经122度以东的地区划分南北满洲，分别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在谈判中，日本并非没有意识到与“南满”相邻接的内蒙古东部的的问题。当时日本企图以对俄国在外蒙古具有特殊权益的承认来换取俄国对日本在韩国具有特殊权益的承认，但是俄国却提出要将蒙古和满洲以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也划分为其势力范围，引起了日本的怀疑。当时的外务大臣林熏认为：“与外蒙古不同，内蒙古位于漠南，与俄国并不邻接而接近北京，若承认（内蒙古）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就会危及支那本土的安全，以至于打破东亚全局的势力均衡。这不仅是帝国所不能容忍的，也违背了日英协约第五条的精神。”<sup>2</sup>日英协约第五条即“保全清帝国的独立及领土”，由此可知，1907年的第一次日俄协约时日本虽然没有对内蒙古东部产生独占的野心，但是已经注意到了内蒙古在与俄国抗衡问题上的重要性。而到了1910年第二次协约进行谈判时，日本表现出了“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野心”。因为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范围内建设铁路引起了俄国以及美国等的警惕，但俄国又因清朝政府借助英美资本建设锦州—齐齐哈尔铁路的计划被延长为锦州—瑷珲（中俄边境）线而对计划本身表示反对，并提出了建设张家口—库伦铁路的计划进行对抗，使日本政府发现如果锦州—瑷珲铁路计划落空，“会造成排除各国在满洲势力的结果而对我大为有利”，所以1910年3月2日作出决定支持俄国的计划。<sup>3</sup>北冈伸一认为：“以俄国的提议为契机，日本的经济的军事的利益关心得以更加向西部延长”，而铃木仁丽将此解读为日本因此“对东部内蒙古的关心发生变化，加深了野心。”<sup>4</sup>

辛亥革命以后外蒙古地区宣布独立，日本政府因为担心俄国因此将内外蒙古均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决定与俄国开始第三次密约，此时开始称内蒙古东部为“与我势力范围的南满洲具有最密切关系的地区”。<sup>5</sup>1912年7月8日签订的第三次日俄协约，将日俄各自的势力范围以东经122度为界改为以东经116.27度为界，俄国承认“内蒙古与中南满洲铁道有着深厚关系的部分均为日本的势力范围”。<sup>6</sup>“以1912年日俄之间缔结的第三次协约的附属密约为契机，日本在东部内

<sup>1</sup>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7頁。

<sup>2</sup> 此為林熏給伊藤博文韓國總監的第69號電報中的一段話，引自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5頁。

<sup>3</sup> 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6頁。該書幾乎沒有提及「滿蒙獨立運動」，但依然對本文多有啟示，在此特致謝意。

<sup>4</sup> 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6-57頁。

<sup>5</sup> 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7頁。

<sup>6</sup> 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8頁。

蒙古的权益得到了承认。”<sup>1</sup>1912年6月，日本还借参加六国银行团的谈判使各国列强同意在会议记录中加入了“日本国银行团，在得到本借款关联事项不给南满洲以及内蒙古东部的日本的特殊权益造成任何不利益的保证下，宣布加入本借款团”一文。<sup>2</sup>

铃木仁丽的研究主要针对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活动，而事实上军方和日本的民间势力在更早时已经对内蒙古东部地区表现出了兴趣。与喀喇沁同处于内蒙古东部的巴林旗，也是与日本较早发生关系的地区之一。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巴林王就和日本的大陆浪人频繁接触。1908年2月，巴林王即以土地未担保向日本秘密借款（具体不详），而日本旅顺都督府陆军部（星野参谋长）极力赞同，理由是：“向该王施恩，打下今后利用的基础。”<sup>3</sup>大约是在1908年间，巴林王还招聘了一位名为片谷传造的日本大陆浪人为自己的顾问。1909年9月6日，片谷传造通过关东都督府参谋长星野金吾找到日本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希望得到对在蒙古巴林与同酋王共同经营事业的赞同”，因为在他与巴林王各出资5万（巴林王以土地二百顷、牛400头、相当于5000元的木材相抵，之外为现金）的合作计划中，由他负责的5万元中仍有1万元没有着落，因而希望得到陆军参谋总部的支持。<sup>4</sup>片谷传造与巴林王之间有一个合作的一揽子计划：成立“德盛公司”，在巴林旗开办实业、包括开垦土地、造酒、采矿、畜牧、甚至发行纸币等。<sup>5</sup>

自1908年底至1914年之间一直担任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的宇都宫太郎，1909年9月接办内蒙古事以后，一直鼓吹肢解中国，变“满蒙”为日本的领土，尤其是将内蒙古东部地区收入日本势力范围，“以备国家他日之用”。<sup>6</sup>这也正是片谷传造敢于来找宇都宫太郎寻找支持的原因。之后，宇都宫太郎先后找到递信（邮政通讯）大臣后藤新平、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等人游说，虽然遭到当时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的阻拦，但是仍然从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处得到了愿意出资的答复。<sup>7</sup>伊集院彦吉之所以反对这件事，只是因为他怀疑这份计划的可靠性及片谷人品，一旦出现差错这些都能够造成外交上的纠纷。果然，巴林王出于担心清朝政府的反对和对片谷的不信任，撤销了这份计划。这件事让宇都宫感到非常惋惜，1910年9月22日上午，宇都宫对第二天即将“入蒙”而前来告别的步兵大尉松井清助勉励道：“第一的目的为彻底研究蒙古语和蒙古文学，彻底研究蒙古以为日本合并蒙古之日所用。”<sup>8</sup>到了1911年1月，片谷再次寻求支持，原因是片谷又说服了巴林王，但是此次满铁只拿出了15000元投资畜牧事业。<sup>9</sup>

毫无疑问，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时期，喀喇沁、巴林、翁牛特等东部内蒙古地区的王公以牧业经营权和矿山开采权为抵押向日方借款，以进行“勤王”之事，也得到了日本军方的积极支持。宇都宫太郎明确表示，“在清国尤其是在满蒙激励获得更多的权益，此事已也向高山、守田、多贺等进行训示。作为矿山开采权的担保已经从外务省拿到八万元，从（参谋）本部拿出三万元、

<sup>1</sup>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2頁。

<sup>2</sup>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65頁。

<sup>3</sup> 〈星野參謀長から外務次官宛の電報〉，明治四一年二月一日，《対支借款關係雜件》/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 2. 巴林王借款申出、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200, 対支借款關係雜件 / 蒙古ノ部(1-7-1-04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4</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09年9月6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268頁。

<sup>5</sup> 北野剛：《明治・大正期の日本の満蒙政策史研究》（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12年），第98頁。該書對本文多有啟示，在此特致謝意。

<sup>6</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0年9月24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374-375頁。

<sup>7</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09年10月8日、9日、11日、14日、18日、22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276-280頁。

<sup>8</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0年9月24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374-375頁。

<sup>9</sup> 北野剛：《明治・大正期の日本の満蒙政策史研究》（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12年），第98-100頁。

共计十一万元经多贺之手交给喀喇沁、巴林等地。”<sup>1</sup>满铁、外务省、三菱财阀的岩崎久弥，甚至是本愿寺，只要是能够借到钱的地方，都能见到宇都宫太郎前往游说的身影。<sup>2</sup>

川岛浪速也就“勤王”之事向日本驻清国公使伊集院彦吉报告经过及对于日本国家之意义，以便得到外务省的支持：“蒙古举兵之事正在着实进行之中，喀喇沁王已经决定数日之内离开北京。”“这是掌握在蒙古各种权利的机会”，积极促成日方向多名蒙古王公借款，如向巴林王借款一万两（以其管辖内的矿山开采权为抵押），“与巴林敖汉等昭乌达盟十一旗之间签订特殊密约之事已经接近成功”，“宾图王已申请借款，协议一两日中即可成立”，“这些借款大部份的用途为举兵之用”。<sup>3</sup>

但是很明显，东部蒙古地区的蒙古王公们的行动，并没有一定要建立“满蒙”国家的目的。与其说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王公，还不如说是川岛浪速对建立一个“满蒙”国家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即使在蒙古扶植我方势力，满洲方面也定会议论纷纷。如果建立了民主国，（满蒙之间——引用者）围绕权利问题的冲突必然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对支那外交将比从前更加棘手，为此两国国民之间感情越来越对抗。列强必然趁虚而入实施离间之计，收渔翁之利。况且蒙古与我国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消除之墙壁（指因为相隔东北地区而没有直接接邻——笔者），因此不仅蒙古之经营总是要受到阻碍，恐怕蒙古自身也会因侧面受到威胁而最终以至于无存。故蒙古与满洲提携方得生存，满洲得到蒙古方得生存。因此，满洲举兵即使有一定困难，但也要排除障碍坚决实施之。”<sup>4</sup>这一点与川岛的政治态度有关，他一直积极主张帮助恢复清王朝的统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剽悍勇武的蒙古人。他在1911年12月13日发给福田安正的电报中说道：“东部蒙古王公越来越团结，而满洲人大多缺乏气魄，不值得依赖，且有类似乌珍那样已为袁世凯所收买的。”<sup>5</sup>

内蒙古东部王公的“勤王”最终也没有付诸行动。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的政策出现了变化。清皇室退位、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俄英两国极力主张在袁世凯的领导之下统一中国，也包括东北地区、即“满洲”在内。碍于这种国际局势，日本政府2月20日做出了最终决定：只要是没有妨碍到日本的“在满特殊权益”，就对中国内政保持“严正中立”。因此，教唆蒙古王公“举事”的行动被叫停，对各个蒙古王公的借款总额也被限制在15万以内。川岛也因此被参谋本部次长电召回日本国内，<sup>6</sup>并被严令禁止继续参与“蒙古举事”。<sup>7</sup>为了褒奖川岛浪速在义和团事件时与多贺宗之少佐积极配合军部的表现，以及对他个人当时所破费的私财的补偿，5月4日，宇都宫太郎还以“清国学生管理委员长福岛安正”的名义，从该委员会资金中拿出了5000日元“赠与”了他。<sup>8</sup>

<sup>1</sup> 宇都宫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4月11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00頁，

<sup>2</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4月11日，5月7日-5月10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00頁，108-110頁。

<sup>3</sup> 《对支借款關係雜件》/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对正金銀行 / 4. 喀喇沁巴林借款（対大倉組）、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400，对支借款關係雜件 / 蒙古ノ部（1-7-1-04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四號）一月三十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6頁。

<sup>4</sup>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7頁。

<sup>5</sup> 〈在北京川島から次長宛の電報〉受七九二、6 明治44年12月12日から明治44年12月1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24400，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 / 陸軍ノ部 第三卷（B-1-6-1-39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6</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2月26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88頁。

<sup>7</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43、150頁。

<sup>8</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5月4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07頁。

为了支持蒙古举兵，日本军方曾于1912年2月1日决定向开元（开原）运送枪支500挺，子弹20万发。<sup>1</sup>除了前一年中已经派遣前往满蒙地区的多贺宗之少佐外，高山公通、守田利远大佐、松井清助大尉等也在此时陆续来到了东蒙地区。在得到了“严正中立”的命令后，参谋次长福田安正通知当地的日本军官等候时机，借此时机“精练军队，秘密储备大量兵器弹药，令各王公相互联合，以便他日协同行动”。<sup>2</sup>福岛正安于4月26日被任命为关东州都督（即当时日本在辽东半岛占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sup>3</sup>5月22日宇都宫太郎在新桥车站为福岛送别，福岛告诉宇都宫，西园寺公望首相面命福岛一并处理“蒙古的事情”。而宇都宫太郎在听到此话后想到的却是：“勿论满洲应该完全由都督来处理，但蒙古则应该交予参谋本部直接经营可能会更好一些。”<sup>4</sup>

川岛浪速为了给在喀喇沁旗的所谓“勤王军”运送军火补给，在日军多贺宗之少佐、松井清助大尉等人的帮助下将一大批军火从旅顺通过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运送到了公主岭，之后装上马车准备穿过吉林、辽宁、内蒙古交界处的郑家屯运送至喀喇沁。此次行动有多名日本人参与，由外号“薄天鬼”的在东北的日本马贼薄益三及其侄子“薄白龙”领导，另有中国马贼左宪章（薄益三的拜把兄弟）带领大批马贼进行护送。但奉天将军赵尔巽侦悉了川岛浪速的计划，严命驻郑家屯统领吴俊升进行拦截。6月8日，运送队伍在奉天近郊的郑家屯附近与中国军队发生枪战，13名日本浪人和30多名中国马贼被击毙，随行的松井清助大尉也受了重伤，薄益三等23名日本人被捕，43辆马车上的武器都被悉数烧毁。<sup>5</sup>“蒙古举兵”、“勤王”乃至所谓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有趣的是，在清帝退位以后，许多蒙古王公纷纷投向了袁世凯，如曾经由清廷派往日本留学（在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在决定清王朝前途生死的御前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反对过清帝退位的帕勒塔，很快就投入了袁世凯的阵营。也有部分人确实开始了“独立”的活动，而这一活动又让他们与川岛浪速走到了一起，贡桑诺尔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通过川岛向日本借款和购买军火，潜回本旗图谋起事，但是因为武器被截梦想成为泡影，最后才不得不回到了袁世凯的身边。<sup>6</sup>这些再次说明，蒙古人与“满蒙独立运动”，不过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不过是民族的独立，而川岛等人的主动接近，不过是给了他们一条接受日本援助、从而便于走向独立的道路而已。然而，川岛本人的想法显然不是为了蒙古的独立，而是为了维持清王朝及其余党的统治。这一想法虽然与宇都宫太郎的观点相同，但是却遭到了以外务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的反对（虽然一时也有这种想法）。川岛就是要利用勇敢剽悍的蒙古人来实现这一目的。

事实证明，虽然被冠以“满蒙”之名，然而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不过是在以日本军部支持为背景的川岛浪速的设计、策划和利诱下才能够成型，其策划人、发起人、精神领袖、运动核心甚至运动主体都既不是“满”，更不是“蒙”。川岛浪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表面上看来尽是清人

<sup>1</sup> 宇都宫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2月1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81頁。

<sup>2</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49頁。

<sup>3</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4月26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05頁。

<sup>4</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5月4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13-114頁。

<sup>5</sup> 根據中間立夫獨自發現的資料，薄益三在被中國地方治安當局逮捕後的供詞中，稱此次運送的物資為步槍1500支、子彈30萬發、短槍200只和25000元、銀500兩等，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56頁。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8月10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37-138頁中記述為「兵器步槍1500支，子彈30萬發等」。

<sup>6</sup>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際駐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動》，內蒙古大學中國內蒙古地區黨史、內蒙古近現代史研究所編：《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三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3頁。

自由行动，我国只是在暗中给予支持而已。”<sup>1</sup>尽管其目的与其他许多大陆浪人的在华活动一样为扩张日本在华势力范围，然而由川岛浪速设计的“满蒙独立运动”不是通过利用新的反政府势力去开辟新天地，而是借维持和恢复传统王朝的名义利用旧势力直接控制一直为日本垂涎的满蒙地区，真可谓是独辟蹊径。由于这一特点，川岛浪速的许多想法与做法也是独出心裁。例如，袁世凯之所以要遭到反对是因为他导致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不是因为他抵制了革命党，以反对皇室退位为目的而成立的宗社党能够被转化成了“独立运动”的象征，边疆地区的“民族”的要求在软硬兼施的利诱之下很快就冠上了“勤王”的美名。

中间立夫认为，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作为一个实体并不存在，它只不过是川岛浪速所追求的一个幻影。<sup>2</sup>因为所谓“独立运动”，究竟指的是“满洲”或“蒙古”地区的独立，还是“满”族或“蒙”族的民族的独立都说不清，而“复兴清朝”与“满蒙独立”二者的政治方向根本不同。<sup>3</sup>究竟是“打造满蒙为一个统一的新国家”呢，还是割据过去的清王朝领土的一部分拥立肃亲王建设一个新国家呢，而且这个满蒙新国家的领域范围究竟在哪里？所谓“运动”根本就没有一个明显的目标。<sup>4</sup>他的看法的确有着一定的道理，要让“满蒙”这样两个本来就为不同的民族集团构成一个“独立运动”的主体，天生就具有了一种矛盾性和对抗性因素在内。

#### 4. 川岛等人政策提案报告中的“满蒙独立”话语

肃亲王善耆来到了旅顺之后曾经吟诗一首：“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sup>5</sup>这些对往日权贵生活的留恋，能够令人感受到他何以要去追求“满蒙独立”。然而，一直与肃亲王保持联系的川岛浪速以及其他支持“满蒙独立”的日本人又是出于什么用意呢？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着当时这些人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政策提案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在所谓“满蒙独立”的问题上，他们其实有着肃亲王不可能想到的目的。被召回日本的川岛浪速耐不住寂寞，于1912年（大正1年）8月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两份政策提案报告，其一为8月25日提交的《对支那管见》，另一为8月28日提交的《对于和平对支外交之私见》。其中，毛笔书写长达46页的《对支那管见》<sup>6</sup>（以下简称《管见》）全面阐述了他对中日关系的见解。从他对于北部边疆的“满蒙”、特别是“蒙古”与中国近代国家之间关系的解读来看，其中所展现出的川岛浪速关于“满蒙独立运动”的思路至今仍然值得注意。

1. 中国未来的局势必将是一场大分裂，这是由于中国、汉民族的“一团散沙”的国民性所决定的。由于这种国民性，汉民族不可能具备作为近代“国民”的素质：“吾人之口癖，常以沙子比喻汉民族，是因为性格如沙子。任何一粒都个个坚固如石，自我守卫力量坚固不易粉碎。此正如支那人的利己观念极端发达，其保卫自我利益的能力是我邦人远不能及。然而由于沙子个体过于坚固因而其粘合力完全消失，无法将其多数合而为一个团结体。此正是支那人即使具有成为一个人种的能力，也缺少成为国民资格的原因。”（《管见》第10-11页）

虽说中国发生了“革命”，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一团散沙的国民性，反而使这种国民性得到了释放的机会：“世人常视今回革命之乱为汉民族觉醒奋起，以为将来出现一新

<sup>1</sup>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7頁。

<sup>2</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253頁。

<sup>3</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06頁。

<sup>4</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24頁。

<sup>5</sup> 〈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上），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第302頁。

<sup>6</sup> 川島浪速：〈對支那管見〉（〈對支管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78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国家之希望，其实是一大谬误。爱新觉罗氏用来囊括之皮囊三百年间已经腐蚀朽废，……至于去秋彻底破裂，囊中沙粒尽然散乱于地，以致再无收拾之器。此为今次革命乱之真相，决非意味着囊中沙子开始活动自己冲破皮囊。试想义和团以前支那人之状态，屈服专制政治，发一言书一字尚且战战兢兢，决非敢触犯一点忌讳，故十年以内此国民性绝不可能在短短日月中出现根本变化。”（《管见》第12-13页）

2.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只有走向更加分裂，而帝国主义列强必将借此机会在中国分割争抢自己的势力范围。“只见全社会充满不义诈术、无耻诡计、欺瞒排挤、苟合反复、横夺虐杀等各种罪恶，分明不过是乱沙散漫一片，何处可见共和之真意？如洒水于沙虽一时可以凝为一团，……水即利益之水，然一朝水干即立刻分手，此亦沙之本性也。彼袁世凯为支那人中性情和才智最为发达者，亦不过为此种散乱沙粒中最大的一颗而已。满腔个人野心，毫无诚意可言，只有一时权术，而无立百年之国经纶。……然沙子最终无法集合团结沙子，……如最富于支那式伎俩的袁世凯尚且无望，即使孙黄（即孙中山与黄兴——笔者）又怎能完成统一之业。吾人敢于断言，以此汉人种之性格，即使出现一二豪杰，也难以找到统合全体之方。因此，只要没有一种新的力量对其国民性加以根本改良，支那终究无望组织一个健全的国家，为最早难逃亡国命运之属。这是帝国制定对支那政策的最重要的出发点。”（《管见》第15-16页）“据吾人所知之现状，中华民国分裂土崩之势或者不出数旬。……最终各国肆无忌惮地以武力制定压服自己有利的势力范围。”（《管见》第17页）

3. 日本固然有独自征服中国之能力，但为国际局势所不容，因此中国最后只有被列强分割。但如果列强分割了中国，则必然会对日本也造成威胁。“元清诸族尚且完成征服之功，况我帝国具大元清数倍之力，征服汉族决非难事。然眼下国际形势不会容忍帝国单独占领，如此一来只有列强分割一条道路。”（《管见》第18页）“勿论分割时机到来时帝国也会占有其中一份，然并不可以此为庆喜悦，因其恐引来远方的欧美列强与我擦肩比踵邻近接触，致使我国外交愈加困难，不堪烦累。即使帝国势力发展，也有直接给予他国压力、肇白种联合之端，乘我国实力未有充实之机实施压迫，陷帝国于无法再起之境地。”（《管见》第2页）

4. 为了应对这种列强分割中国、进而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局面，日本应该加强在中国的实力，找到巩固的落脚点，而最好的目标就是满蒙地区。“要之，在支那领土上加强我国实力，将来无论出现何种事态，我们也可以对列强一直优胜的地位，发挥东方主人公的实力。”（《管见》第3页）“为了实现以上理想，首先就要从满蒙出发建设和巩固我们的立脚点。”（《管见》第3页）“不论中华民国是否成立，为了帝国的生存发展，作为建立解决支那问题的立脚地，都应该趁此良机将满蒙完全收入我实力范围之内。”（《管见》第5页）

“我一直反对帝国采取俄罗斯式的单纯无意义的侵略政策，但认为必须得到满洲之一部及蒙古东部，今次列举其理由。一，出于针对俄国势力保卫我国的需要，……；一，将来不论支那或其他亚洲方面何等强国勃兴，帝国至少在满蒙方面具有坚强的立脚点就可以掌握亚洲霸权，持此牛耳可一直制约操纵诸国，……；一，适当安排以异常速度不断繁殖增加之人口，为救国民脱离将来之生存竞争的大苦境而准备人口稀少的领土；一，通过殖民加深与母国之关系，制造终古不可分离的集团形势，……；一，占有天然富矿未开的地区，……；一，为最终解决横在眼前的支那问题而在大陆占据最为有利的立脚点。”（《管见》第1-2页）“无论将来在支那及其他亚细亚方面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强国，帝国只要在满蒙方面具有巩固的立脚地，就可以永远握有亚细亚的霸权。”（《管见》第1页）

5. 然而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日本也不能实行对“满蒙”的直接占领。一为，“最值得担忧的是，一旦帝国为始作俑者，必然出现列国仿效的结果。”（《管见》第6页）另一为，如果日本直接占领满蒙，就会变成满蒙与日本相对抗的局面，那么日本至少需要三至四个师团才能够镇压。即使镇压成功，驻守广袤的内蒙古的守备部队就需要两个师团。但当地人因此心中越来越仇恨日

本，与日本永远对抗，反而使日本永远得不到满蒙。（《管见》第7-8页）

6. 通过以下步骤最后实现占领满蒙的目的，“不如暗助利导当今满蒙人脑中和发现中的独立实行，只待时机成熟后，表面上是他们自己希望从支那分离出来自成团体，日俄协力首先共同对其暗助密援建成一个事实上的保护国，使此满蒙团体不得不与支那本土进行对抗竞争，因而势必成为愈加依赖我方的一种势力。而我方则在一段时间内利用该势力，根据两国之间提前协商的势力范围，逐渐掌握政权收取权益，不出数年帝国即可在南满洲及内蒙古方面形成坚定的巩固的实力。此即省力节费避名取实之法也。”（《管见》第6页）

第一步通过诱导和支持满蒙在实质上的独立使其成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是日本逐渐掌握这个保护国的实际权力，在此之上才是第三步、即寻找直接占领的机会：“如他日遇到公然割取冠以我国领土名义的机会，只要立刻再来一次类似合并朝鲜时的手续即可矣。当然，这比起朝鲜来说要更加容易。所以，只要首先帮助他们成功，在恩威并施之上适当怀柔控制操纵，让他们满蒙人个个感觉生活幸福增长，其来归化自如水流入卑。此为五千年来彼等传承而来之国民性，为历史所屡屡证明。欲取其国者先取其民心，千古不易之原则也。”（《管见》第6-7页）

7. 这个国家必须是“满蒙”一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支无敌于中国的军队：“如能如上所述巧妙利导满蒙人使其实现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的希望，促成感情融和相互信赖之状态，我们的理想就不难实现。使其一切政务大都凭借邦人（即日本人，下同——笔者）之智识方能运转和组织，可使其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军备，让独立军之精锐兵力在邦人的指挥训练下成为全支那都无法比拟的强兵。”“蒙古人无疑具有惊人的体力和勇气，说按照蒙古式的实践和训练的兵卒材料冠绝世界也不为过（但日本人除外）。虽说当年作为成吉思汗的部下扫荡横行世界的资质并没有全部湮灭，不过这三百年中中了清祖的巧妙政略之毒，一直安于晏然愚昧而已。如今彼等蒙古人正从长夜睡梦中醒来，但是尚无指导统合的有智识之人。如果以邦人的智识、德性、勇气，由邦人隐然起到首脑作用，建成一支坚强团结的军队，必能够发挥出惊人的强大作用。”（《管见》第8-9页）也就是说，在川岛浪速关于“满蒙独立”的思想中和如何付诸实施的思路，蒙古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武装力量。

8. 利用练就出的这只军队，借汉民族对北方民族的恐惧感，以便最终达到以满蒙控制中国的目的。“对汉人种来说，古来认为北方强悍之传言至今犹为事实。居住于满洲的汉人之勇悍刚强气势且远胜于支那本土，如使满蒙人坚强联合团结，勿论其武力将无敌于四百余州。”（《管见》第8-9页）“我最终拿出的方案，即上述通过满蒙独立建立立脚点之策。建设一个有名无实的保护国，掌握其实权，培养其兵力，到了中原溃乱不得不收拾之际，立即暗中指挥彼等满蒙团体以猛烈的武力（勿论当以日本人为其中首脑）突入中原，以令人恐怖之威力攻击之，以恶鬼罗刹之势踏破之，就如在沙中滚滚滚烫的大铁球，使其四百余州无人敢于抵御。以彼等汉民族性格，即刻战栗恐怖、小儿止啼、望风而降，与当年元清侵入时毫无二致。而帝国只要能够始终掌握满蒙团的命门，能够控制并教其建立巧妙对内对外政策，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可以轻易统一半部，如此他们的国权及地域所至即为帝国的势力所至。在支那国土上无论出现如何事态变化，无论其统一是否长久，我方只要在此期间建立排除不了之实力，就绝无落人之后之虞。”（《管见》第18-19页）

川岛浪速之所有会有以上关于“满蒙独立”的思想和思路，按照他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在“满蒙”地区“打下安定坚固的发展基础”，“关系到帝国百年国运的屈伸消长”，所以他才为了实现“满蒙独立”而“苦心积虑”。（《管见》第17页）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川岛浪速关于“满蒙独立”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在为了实现日本的利益。如果不能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川岛浪速是不会支持“满蒙独立”的：“如果按照我的设想决定首先促成满蒙独立，须具备以下要素：一，首先在帝国与满蒙团之间进行意思疏通，为了建立强固的结合关系而使其完全相信我方对其之保护；一，使满蒙团的内政外交完全听从帝国的指教，文武要职通过合适名义全部启用邦人（即

日本人)，由邦人掌握实际的枢纽；一，为达到以上目的，成为满蒙团主脑的人物，必须由我方选择我方信任并认为可以成为傀儡而自由操纵的人物。”（《管见》第 19-20 页）

1912 年 8 月 25 日的《对支那管见》说明，川岛浪速进行“满蒙独立运动”的最终目标，至少在此时已经不再是为了恢复清朝，而提出“满蒙”的概念也不过是为了进行操纵而已，而操纵“满蒙”的目的，已经是为了保证日本在整个中国的利益。正如波多野胜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川岛浪速来说孙文的革命不值一提，他的关心不在中国南方而在满洲及中国北方。虽然的确具有同情清朝的成份，但是在他的视野里，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客体，只不过是为了强化日本的存在根基的一个政策而已。”<sup>1</sup>

川岛浪速于 1912 年 8 月 28 日向外务省提交的第二个意见书《对于和平对支外交之私见》<sup>2</sup>（以下简称《私见》）只有短短四页，从内容上可以看出，这是在他提交《管见》之后又紧急写就的。其背景一是日本与俄国于 7 月 8 日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协约》，二是国际社会开始讨论对中华民国进行承认的问题。如前所述，日俄第三次《日俄协约》的《秘密协议》的内容主要就是重新划分两国在内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sup>3</sup> 最近由于逐渐受到俄国行动之刺激，在满蒙问题上全国普遍产生不安，有关满蒙处理方法事实上已有成为国民普遍关心之一大问题的倾向。”（《私见》第 1 页）因为 2 月时川岛浪速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之所以被叫停，原因就是俄英两国主张在袁世凯的领导之下统一中国，保全中国领土完整。所以可以想象，当川岛浪速知道了日俄两国之间关于内蒙古势力范围的秘密外交活动之后，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私见》开门见山即提出：“如果帝国想要实现帝国在满蒙长久以来的理想，通过和平外交方式从民国得到在满蒙的权益，那么就不能不首先提出充分具有价值的要求进行谈判尝试，其要义与主要着眼点必须是争取与俄国在满蒙之所得利益保持均衡。出于生存和自卫之目的，帝国可以堂堂正正地就自己所应该得到的东西提出要求。估计世界各国原本明白，甚至心中已然理解。尤其是英俄，对照其自身在蒙藏之行为，本来就已没有对我行为容喙之权利。帝国也必须让民国看到这一点，让其明白只有承认了这一点，两国之间才具备提携的可能，因此知道答应给予俄国的权益，必须与给予帝国的权益相等。必须看到，如不采取这种态度而只顾迎合民国之感情，即如他人所说：为一时之策而满足于得半文一钱的乞丐外交，会为将来留下后患，成为一大失策。”（《私见》第 1 页）

“可以预料，如现内阁依然实行姑息的对支外交，即使有些零碎所得，国民也决不会满足和对之进行讴歌，反而可能以此为攻击政府的材料，大呼政府外交无能。”（《私见》，第 1-2 页）“俄国在蒙古方面的行动到何种程度可以为我国对支外交的重要指标。我们必须按照这种程度，不得更改。我认为俄国必然只有推进而决无后退之理，即使一时停滞也必然会再有第二、第三步，得寸进尺已是必然之势，无疑是企图在占有了全蒙古之后再染指中原。更何况支那自灭自亡已是必然之势，不久的将来万里长城将会践踏在俄军骑兵铁蹄之下。”“支那的最后结局，不过是一个是由俄国而为还是由帝国而为的问题，只是迟速问题。此亦帝国的存亡兴废之判决，岂可局促于目前而忘长计。”（《私见》第 2 页）

川岛浪速建议利用新生的中华民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机会，在满蒙问题上同民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依我预料，目前俄国在（外——笔者）蒙古的活动一定能够成功，不论以何种名义或何种一时之计，其实质无疑都是要由俄国掌握实权和独占权益。更何况西藏业已落入英国之手，民国要想完全恢复全部领土已经无望。因此，如果承认民国，如何认定其领域将会是一个

<sup>1</sup> 波多野勝：《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 研究所，2001 年），第 78 頁。

<sup>2</sup> 川島浪速：〈平和的对支外交ニ対スル私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2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3</sup> 關於第三次〈日俄密約〉的詳盡內容，參見蔡鳳林：《日俄四次密約——近代日本滿蒙政策研究之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80-130 頁。

大问题。例如，如果俄国在全蒙古的意义上承认民国主权，那么帝国是否应该对此默认？或者俄国欲使蒙古之一部脱离民国范围，那么帝国是否应该默认其分界线？俄国若号称与帝国尊重协议范围而自定分界，因其事实上掌握实际权力，而我最终也不过是徒拥虚名而已。但如果帝国将此独立出去的蒙古地区也无条件地认定为民国的领域，无异于自认东部蒙古将永远不会为我所有，就会自绳自缚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若他日再想从民国割取该地域，就等于自求对全世界背信之名。考虑到这些，就可知对于帝国而言，是否承认民国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关系重大、并非一个以些微利益就可以成为交换条件而轻易答应的问题。我认为我国政府必须在此问题上进行深思顾虑。”（《私见》第2-3页）

川岛浪速并且直接为日本政府设计了从中国割让满蒙地区的具体方案：“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作为承认民国的交换条件，帝国政府应该获得在满蒙的权利。姑息是绝对得不到敬服的手段。虽说不如以某种方法使满蒙与民国自动分离更好，但我国政府必须制定出方针。而在未承认以前，帝国可以提出关于满蒙的条件之要领大体如下：一，民国若要承认俄国关于蒙古独立的要求时，不能将东部蒙古（以图明示）划入其范围内；二，永远不许将东部蒙古割让于他国；三，俄国臣民在蒙古得到的商业工业上的特权，帝国之臣民也必须在东部蒙古得到与此相同待遇；四，若俄国在蒙古铺设铁道，就必须在东部蒙古为帝国保留此项权利；五，不许将南满洲及东部蒙古的土地矿山森林铁道及其收入让与他国之人，或者以其为借款之理由；六，不许将南满洲及东部蒙古的铁道铺设权利给予他国；七，给予帝国建设吉会铁道及奉海铁道等我国之急需各铁道的权利；八，给予帝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全境居住、营业的自由和土地所有权；九，延长所有各项帝国在南满洲既得权的期限。”（《私见》第4页）

那么这些川岛浪速提出的日本关于“满蒙”的要求，与他所鼓吹的“满蒙独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无法肯定民国政府是否接受以上条件。如果不肯接受，就可认以此认定民国无视帝国在东亚生存和自卫上的权利，宣布民国缺乏与帝国一致协力维持东方大局的诚意，暗中反对承认民国，同时在满蒙问题上作出允许其自由活动的姿势。在今天的状况下，他们最终会不得不屈服，何况民国已经不得不放弃外蒙，在西藏问题上也要答应英国的要求。”（《私见》第4页）也就是说，川岛浪速希望日本政府学习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做法，将鼓动“满蒙独立”当做一个不时要挟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要求的工具。

当然，将“满蒙”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想法绝对不是川岛浪速的创作，而将内蒙古东部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一事，不仅得到了日本军部的支持，也是许多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日本政治家和大陆浪人的共同愿望。1911年10月，井手三郎（众议院议员）、岩田凡平、小越平陆（大陆浪人）、田锅安之助（东亚同文会常任干事）、根岸佶（《东京朝日新闻》政治部记者）、中西正树（大陆浪人）、中野二郎（大陆浪人）、中村弼（《二六新报》主笔）、山内岩（大陆浪人）、松平康国（汉学家，曾为张之洞顾问）、荒贺直顺（大陆浪人）、宫岛大八（书法家，川岛浪速好友）等人<sup>1</sup>向外务省提出了一份《对支那时局卑见》（以下简称《卑见》），<sup>2</sup>内容主要也是关于“满蒙问题”：“鉴于俄国在外蒙古活动，日本应借机将内蒙古收入我势力范围之内。”

《卑见》主张将日本的势力范围由“南满州”扩大到内蒙古的理由有三点：“将此地收入我方势力范围，以此作为对抗俄国的立脚点。此为需作如此处理之第一理由”；“如果能让支那政府常常与我方采取共同行动，就有必要使其一直感到我们的震慑力。如果我们收入内蒙古并在此铺设一条可以从奉天到达张家口附近的横断铁路，我方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向北京背面运送大量兵力，北京政府自然会因此一直感受到我方压力，恰如俄国想铺设恰（恰克图——笔者）张（张家

<sup>1</sup> 以上人物簡歷一部分參考大裏浩秋：〈漢口樂善堂の歴史〉（上），神奈川大學人文學會《人文研究》第155期，2005年，第59-87頁。

<sup>2</sup> 〈对支那时局卑见〉附圖略解，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1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口——笔者）铁道却由我取而代之。北京政府因感知我方有此准备方才能听从于我，如果不做这种准备而漫谈保全（中国领土——笔者），日后难保其不会成为英美走狗而反咬我方。此为需作如此处理之第二理由。”

作为“需作如此处理之第三理由”，《罕见》则是分析了汉民族的国民性：“正如某人对支那民族所疑：极端自私的人民今后如何能够在与列强的竞争中立足和维持国家独立？作为政治的国民极端缺乏公义心，作为军人极端怯弱。如以此等人民组织国家，其结合力自然极端薄弱，稍有动作即会自行崩溃，遑论面对外敌抵抗能力微弱。如果今后祸乱续发，支那自动解体，受到最深刻影响的无须置疑即是我们日本。”“如俄如法如英，都是通过其属国边境与支那相接、而本国在数千海哩之外，不会受到发生在支那政治变革的影响。只有日本，支那的存亡兴废马上与本国的国势力消长相关，严重时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笔者）独立。”“况且今后我国今后主要发展方向，为通过领土近接、能够缓急相救的支那向外发展。但是（支那——笔者）万一发生问题，就等于出路遭到堵塞。”“尤其是今后支那因局势的变化而发生自行崩溃或被分割等与日本兴废发生紧密关系的问题时，日本就不应该将支那交给横行的乱民和互相争夺的白人，而应该主动出兵解救遭到涂炭的国民，从而履行作为友邦国家的最高义务。虽然支那现状如此，尚不知何时发生问题，但是应该从现在起就制造立脚点。”

虽然川岛浪速所提出的《对支那管见》在《对支那时局罕见》之后，但从关于汉民族国民性的议论上来看，《罕见》可能是受到了川岛浪速思想的影响，或者是二者之间互相影响。无论是从对抗俄国上，还是从牵制中国的问题上，还是因国民性而导致分裂后对日本影响的分析上，《罕见》的思想都与川岛的想法十分接近。但是与这些人的空泛议论不同，川岛浪速明确提出了一条实现“满蒙独立”的路线图，并且采取了具体的行动。川岛浪速的思想和行动，对日本主张向大陆发展伸张国力、因而一直对俄国抱有高度警惕的所谓国权主义者起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辛亥革命发生、尤其是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在“满蒙”问题上开始变得暧昧，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从1913年春开始逐渐改变他的对中国方针，<sup>1</sup>开始与在1889年时即已开始策划“满蒙独立”、<sup>2</sup>因而被称为“满洲建国先驱者”<sup>3</sup>的川岛浪速迅速接近，转向赞成从中国分裂满蒙地区为日本保护国的活动，<sup>4</sup>这应该就是内田良平在《对支私案》、《对支问题解决鄙见》等中提出分割中国方针的背景。前文已经提及，内田良平在其1914年10月提交给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公然提出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将统治权委托给日本”，而其中的中日两国《国防协约私案》实即日后“21条”的蓝本。

1913年7月27日，川岛浪速与内田良平等人一起，联合主张对外实施强硬政策（对外硬）的12个政治结社一起组成了“对支联合会”，对当时尚不愿过多介入中国内政的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其中当然少不了“满蒙问题”。1913年（大正二年）8月1日，大竹贯一（国会议员）、冈部伊三郎、中西正树、中井喜太郎（《读卖新闻》总编）、中岛气崙、望月龙太郎和五百木良三（著名国粹主义者）等人共同向外务大臣男爵牧野伸顯提出了《对支那意见书》，<sup>5</sup>其实也主要是强调“满蒙”对于日本的重要意义和在“满蒙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采取的方针：“一，南满洲曾是

<sup>1</sup> 初瀬龍平：《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北九州大学法政叢書1），（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172頁。

<sup>2</sup> 〈川島浪速の支那渡航と最初の滿蒙建国計画〉，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龙会出版部，1935年），242頁。

<sup>3</sup> 〈滿洲建国の先驅者川島浪速〉，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龙会出版部，1935年），212頁。

<sup>4</sup> 初瀬龍平：《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北九州大学法政叢書1）（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173頁。

<sup>5</sup> 〈對支那意見書〉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4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日本丧失 20 万国民和消耗 18 亿国财之地，而今日俄之间协商（指第三次〈日俄密约〉一作者）又同意将南满与内蒙古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日本应该将如何处理南满和内蒙古问题作为合并韩国之后制定大陆政策的原则（实即出发点，下同——笔者）。一，如果确立了这一原则，之后就是捕捉时机，而此绝好时机非今日莫属。只要中国南北交战，就不会受到南北双方的共同反击，同时会减轻抵制日货运动的压力，因此容易坚持这一原则。一，随着支那战局的发展，不论将来满蒙形势如何发展，只要保持现状，不论是进入中华民国治下还是归谁，日本都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蒙的势力，至少要不失时机地获得居住权，向这里事实上进行强行移民以得到扩大势力范围之实。一，如果不能处理好满蒙，日本既无法在国防上保护朝鲜并因此在支那外藩地区不能与英俄保持势力均衡，也就没有办法可以永远对中国政府保持震慑力。何况因为日美条约规定了关于土地所有权事项，<sup>1</sup>移民美国一事不得不放弃。能够代之集中移民、使其重新获得土地的只有满韩地区。”

根据他们的推算，满洲南部和内蒙古尚各有可以开垦为水田的土地面积为 200 万町步（共 400 万町步），<sup>2</sup>可以接纳上百万的移民。据说，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时已经就这一“先帝（指明治天皇——笔者）遗业”决定进行“满蒙处分”的方针，“如果然如此，国民必将继日清、日俄两次大战中的举国一致的传统，为政府之后援，而政府当局者则应成就此千古的大事业，完成明治中兴的伟业。”〈对支那意见书〉虽然有对最新时局的分析，但是从强调要“将如何处理南满和内蒙古问题作为合并韩国之后制定大陆政策的出发点”上来看，无疑也是受到了川岛浪速关于“满蒙独立”思想的影响。

## 5. 成为日本倒袁工具的“满蒙独立运动”

借日本国内主张对外事实强硬政策派（对外硬派）声音的高涨，1914 年 5 月，川岛浪速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自己口述、铅印长达 53 页的政策提案报告《对支外交失败之真因》（以下简称《失败之真因》）。<sup>3</sup>因为他认为：“在我看来，革命乱后我国外交，愈来愈多次失败重重”（〈失败之真因〉，31 页），所以在其中对与日本军方采取不同政策、在中国问题上比较注意与国际社会进行协调的日本外交当局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攻击和原因剖析。

1. 《失败之真因》首先批评日本的对中外交过于迁就中国，其中不乏侮辱中国之语：“制造骄妻、狎妾、豪奴、悍婢之根本原因，不外乎主公最初一念之差而丢失治家御人之要。我在支那十余年间处于最了解双方的位置，在我看来，日本的支那外交历来如此。”（《失败之真因》，4-5 页）“支那人好似有怪癖之马，如按一般马匹骑乘，不仅会马上失控，甚至有跌伤之虞。（但日本——笔者）尽管失败再三，至今不能觉悟，而是向错误方向寻找原因，往往按照敌手的借口或假像去努力消除障碍，以为以此迎合对方欢心误解必能冰释，设想对方既已向我倾注诚意，当会圆满解决我方之要求。更有甚者，即使践踏自国的权威与面子也要想法顺从对方意志。然奈何对手绝无诚意，只是更加乘虚而入，其得陇望蜀之欲毫无止境，与注水于无底山谷无异。”（《失败之真因》，5-6 页）

2. 指责日本外交之所以迁就中国，是因为外交当局和外交官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国民中没有如他这样熟悉中国人国民性的。“要而言之，对支外交之要诀即为熟知支那人之性格基

<sup>1</sup> 指美国加州旨在限制日本移民于 1913 年 5 月通过的〈外国人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国拥有土地和资产。

<sup>2</sup> 一町步为 9,917.35537 平方米。当时一户日本农民耕地为 5 反（半町步），一户朝鲜农民耕地为 2 町 5 反，而南满洲一户农民耕地为 21 町步。参见〈对支那意见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400，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3</sup> 川島浪速述：〈对支外交失败之真因〉，出版地和出版社等信息均未有记载，1914 年。另见〈对支外交失败之真因〉，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7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

础之上驾驭之。”（《失败之真因》6页）“我国官民中以支那通自任者甚多。……然吾人独窃曰：似吾人长久居于可咀嚼支那人性格之境地者稀。吾人自青年时代从事研究支那，数度跨海，居于其地，前后多年，多次扮作支那人徘徊于各省之间，不仅亲历人情风俗，又于义和团乱后常居北京。由十余年间所得支那人观而观之，知前者不过是观支那人性格之皮毛。而因拳匪乱时之历史关系，吾人北京生活之地位竟如准支那人官吏。而彼等于吾人亦不视为纯粹外国人，犹如对待自国一官吏，此与一般所聘用教师或顾问之趣大异。……吾人亦扮作同化，以尽力令其暴露真实想法。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四民，尝试广泛接触社会各层，时而作为上官、同僚、属僚甚至属下，时而作为掌握赏罚升降之全权指挥监督部下、兵卒、学生等大量人等。”（《失败之真因》7-8页）

3，川岛浪速号称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了解到了中国人虚伪、自私、善于交际的国民性，指出包括外交官的日本人，大多因为蔑视中国而被中国人所轻易蒙蔽：“支那人绝对为丧失诚意之人种，妙于虚饰，巧于辞令，冠绝世界。其接人待物不过彻头彻尾虚伪修饰，即其国人之间交际、甚至在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亦难流露真情。”（《失败之真因》10-11页）“若是自己可以得到利益，彼等即使持鞭捧履之劳也在所不辞。即使百年仇敌，也可示以不啻于骨肉之忠爱，其亲切周到奉承迎合之妙无有一国可达其域。”（《失败之真因》11-12页）而日本的外交官却“常以自家理想感情推定彼等，提前尽我情谊以候彼等知恩还报，其淳朴律仪之美风不能不令人感动，然最终却不免失望重重，此即我对支外交失败之原因。”（《失败之真因》13页）“称支那人每个人都有外交手腕绝不为过”，（《失败之真因》14-15页）“然而多数日本人视支那人为蠢物，故在一酒宴一赠与一好辞一甘言之下即被收揽，或者是交谈主义议论之际看到彼等做出赞叹敬服之状，即以意为意气投合肝胆相照。”（《失败之真因》14-15页）

4，川岛浪速批评日本人至所以容易被中国人所蒙蔽，是因为只知道看表面。“无论是外交或是国民之间交际，国人重复失败和失望的原因，皆为不熟悉支那人之真面目。”（《失败之真因》15页）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袁世凯在“军事警察教育财政工艺等种种事业中雇佣大量日本人教师”，原因原为义和团事变中中国人对日本人产生了敬畏与好感，其二为“不外是比起欧美人来工资低廉和容易控制”。然而“国人愚直，随喜渴仰之余，视袁世凯为亲日党之神而崇拜之。”（《失败之真因》18页）“如日本领事，因其雇佣大量国人，不足两日，……亦误认袁为肝胆相照之好友，自信只需交臂一谈万事即可解决。”而实际上袁世凯“为支那人中最能将支那人通有之性格才能发挥到极端之人。”（《失败之真因》31页）“革命乱发生后，在其推翻清朝消灭革命党攫取今日地位过程中，我国当局及多少国人，诚心诚意暗助其成，然观其最近言行对我却毫无报德之心。”（《失败之真因》32页）

5，根据对袁世凯外交的失败，川岛浪速进而提出了他所主张的对中外交原则，一是先施威、后施恩，二是一手按剑、一手交欢，时刻摆出不听命即出剑的姿势。“总之，过去那种单纯希望通过迎合支那人感情而操纵之笔法，实是拙之又拙。吾人敢于断言，如此我国外交势必永远难逃劫难，必无成功之时。”（《失败之真因》34页）因此应该学习元和清的做法，“如先施以威，使深感恐怖之后再施以恩，其驯良柔顺也是世界罕见，此即元清诸族能以少数征服并统御多数之理由，已由历史明证。”（《失败之真因》36页）“故对待支那人之要诀为，右手常扶利剑，而后伸出左手对其言语，汝等如愿与我握手，我等亦会应之而不推辞。如不然，我右手之剑马上飞出架于汝首级之上。如能如此，四亿万人中无一人敢不屈从。如右手无剑只求握手，决不能达到目的。日本对支那一直都有锋利无比之利剑，然藏于匣中，一直徒手笑颜求其握手，故常常失败而无转机。”（《失败之真因》36-37页）

6，川岛浪速在《失败之真因》中用了很长篇幅来批评日本人为袁世凯所欺骗利用，而值得注意的是，川岛浪速所提出的制服袁世凯的利剑，居然是他当年所痛恨的中国革命势力和“满蒙

独立”。“近闻有人提出袁疑孙黄流亡滞留显系日本之意。因此感情不和，为圆满进行交涉，应以何种方式将此流亡之徒辈送出国外，以释其误解得以收我权利。然此为无以上之愚见。”（《失败之真因》32页）“清朝末年，为迎合其欢心，我国曾极力压迫孙黄之徒，而得支那一般青年之恶感，因此由留学生在支那全国遍播排日风潮种子，蒙受大害，然无得清朝丝毫感谢。”（《失败之真因》33页）“如孙黄之辈在我国土，虽为无为之书生，然以奇货可居，正是用于外交计略之好材料，并无拼命防止惹袁误解之必要。……满蒙居北京命运死活之枢机，而袁之存亡在于能否于北京进行统治，故要操纵袁必先掌握其枢机。帝国要想收拾早晚势必土崩瓦解的支那之残局，救济四亿万民，履行保全东亚之天职，（在中国——笔者）唯一的立脚点即为满蒙。”（《失败之真因》38-39页）

川岛浪速在该报告的最后，通过前一年春夏之交收到的一位清朝皇族的来信证明他的观点，尤其是对袁世凯看法的正确性。该信以中文写道：“日本政府宜自命为东方主人翁，仗义锄奸，吊民伐罪，不敢大收私益”，（《失败之真因》46页）“对于中国人民，须用金刚怒目菩萨慈心”，“袁所联者米国（原文如此——笔者），对于日本敷衍而已，明眼人当能知之”，“袁世凯对君父为不忠不孝，对国民为不信不义，东西道德皆无一毫。其人历史具在，可详考之，其名不正，何以外交诸公反欲赞成，得无为袁所欺骗乎？”（《失败之真因》47-48页）

这位写信给川岛浪速的清朝皇族，应该就是肃亲王善耆。肃亲王在逃出北京来到旅顺以后，一直生活在日本势力的保护之下，其每月约1000元的生活费用也应该一直由日本军方支出。<sup>1</sup>1913年12月17日，川岛访问总参谋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提出希望宇都宫能够帮助解决让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其养女川岛芳子前来日本留学的问题。<sup>2</sup>在神户大学所藏《宫岛家文书》中，也有一封恭亲王溥伟在此时期中通过宫岛大八带给川岛的亲笔信，其中写道：“别后常耿耿不去怀，每晤东友必询近况。……知吾兄肃亲王出亡旅大，赖先生一力保护维持，逊听之余，莫名欣感。此次君○来东归，述先生为本朝竭尽心力、劳怨不○，感激之衷，至于泣下。”<sup>3</sup>可以肯定，川岛浪速在此期间不仅与住在旅顺的善耆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依旧在为“满蒙独立”四处活动。

终如川岛浪速所愿，1916年3月7日大隈政权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决定进行倒袁活动。日本政府能够做出这一对中政策的转换，当然首先是不愿看到袁世凯继续掌握中国的最高权力。因为1915年1月18日之后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让日本政府再次感受到袁世凯的反日情绪，因此他们更加希望亲日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派掌握中国的政权。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在前一年的12月12日宣布称帝的袁世凯在护国战争的打击下已经是日暮途穷。按照栗原健的说法，实际上从一月开始，在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主导下，由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的有关局长、部长参加，每周一至两次开会交换情报、研讨制定日本政府对中政策。对中政策分为满蒙方面、山东方面、上海方面和南方方面四个部分，按照日本政府内阁决议中提到的“金钱问题”，决定由大仓喜八郎向满蒙方面的肃亲王善耆提供100万元，其他方面由久原房之助分别向岑春煊提供100万元、向孙中山提供50万元，之后再向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各自提供了10万元。<sup>4</sup>而按照波多野胜《满蒙独立运动》的说法，内阁决议之后第三天即3月10号，久原房之助的“久原矿业”就与孙中山签约提供了20万元的借款，而孙中山的条件自然就是将来向久原矿业提供中国矿产资源的开发权。<sup>5</sup>

<sup>1</sup> 宇都宫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8月13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38頁。

<sup>2</sup>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913年12月17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289頁。

<sup>3</sup> 〈恭親王より川島宛〉《宮島家文書》，神戸大学借用番号1-40-d。○为不清楚字。

<sup>4</sup> 栗原健：〈第一次・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と小池外務省政務局長の辭職〉，《對滿蒙政策史の一面》第六章，（東京：原書房，1981年），第147-148頁。

<sup>5</sup> 波多野勝：《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第155-156頁。

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运动”也因此终于迎来了转机。在得知日本政府政策发生变化以后，川岛浪速等人立即开始行动。但是因为贡桑诺尔布已于1912年9月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出任了北京政府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所以川岛浪速计划中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蒙古人力量、即运动的军事力量的主角，变成了潜伏在达里诺尔湖（盐湖）一带的“蒙匪头目”巴布札布。巴布札布原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后全家迁至奉天彰武县。黑龙会常务干事葛生能久所著、1935年出版的《东亜先覚志士记伝》（中）如此描绘巴布札布的生平：因为家乡常常受到马贼的残害，青年巴布札布为了“挫邪助正”故意投入马贼，“以其勇猛大胆和理智清晰”而“马上成为一方头目，响彻蒙古边境地带。”正好赶上日俄战争，在日军“特别任务班”招募时投入“满洲义军”，因为立下“显著功绩”，战后被日本军方推荐为彰武县巡警局长。但是“霸气郁勃”的巴布札布不甘心一生只做一位行政小官吏，辛亥革命爆发后看到清王朝的没落，“对清朝抱有忠诚之情”的巴布札布毅然率领36名亲信参加了“外蒙独立军”，被任命为“东南方面军”的司令官，活跃于经棚（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所在地）、林西和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下辖的一个乡级镇，清代康熙举行多伦会盟处）地区，被称为“常胜将军”。然而看到外蒙听命于俄国，撤销独立，与民国政府达成“自治”的协议后，又与外蒙脱离关系，独自活动在内蒙古东部西乌珠穆沁旗附近的达里诺尔湖一带，以贩盐为财源进行练兵和等待复兴清王朝的机会。<sup>1</sup>

但是，根据1916年3月27日当时奉天满州铁道公所提交的报告，巴布札布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马贼”和“蒙匪头目”而已：“蒙匪头目巴布札布，曾为开鲁县之一个小官吏。当年札萨克王逃亡外蒙时，彼亦加入行列举起叛旗，成为一名蒙匪的军官，其实不外乎是一位并无任何学识的野蛮的普通的马贼，如果认为他是一位主张内蒙独立的具有政治卓见之士那就完全是一种错误。”“怀柔巴布札布是袁世凯最费苦心的一件事”，最终派遣与巴同为土默特左旗人、为巴所信赖的玛哈尔巴萨尔与巴布札布谈判收编。对于巴布札布提出了7个条件和6个附带条件，“中央政府认为要求过分，虽其中一半可以接受，然其余的各条如不加以修改则难以接受。”如认定兵员为5000人，拨发武器5000枝，不顾其他蒙古王公利益划分驻防地域等，加上南北战事，谈判遂未再继续。<sup>2</sup>而日本外交史料馆中所藏当时的一份报告书——《蒙匪讨伐状况》则说：“蒙匪头目巴布札布，据说原为土默特旗之五品顶戴蓝翎巡官，又据说原为宾图王旗或喀喇沁旗的喇嘛僧，转而投入马贼，势力渐大，跋扈于东南内蒙古地界，后又进入锡林郭勒盟各旗，麾下号称万人，初次南下即陷林西，进出多伦诺尔，遥遥威胁北京。虽其最终目的是在普通匪贼式的劫掠抢夺，还是在摆弄锋镝、任侠骁勇于乡关，还是在通过反抗袁政府达到何种政治目的尚且不清，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现在是同时三者具备。”<sup>3</sup>

按照《东亜先覚志士记伝》（中）解释，巴布札布之所以同日本方面建立起了联系，是因为巴布札布“与中国军队屡屡交战，但因交通不便的边境地区无法补充武器弹药，一时退至哈拉哈河地区，同时为了充实兵力岸，遂向多年信赖的日本方面求援”，通过居住在海拉尔的日本人宫里好磨派遣了两位部下于1915年6月间偷偷来到了日本。但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又通过大原武庆找到了计划满蒙独立活动的川岛浪速。川岛等人决定进行对其支持，11月间派遣当年曾经帮助孙中山在东京建设军事学校“浩然庐”的预备役骑兵大尉青

<sup>1</sup> 《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上），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第625-627頁。

<sup>2</sup> 《奉天滿州鐵道公所開申蒙匪頭目巴布札布懷柔策ニ対スル政府ノ苦心ノ件》，大正五年三月二十七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4018113300，公文雜纂・大正五年・第三十九卷・建議・建議（国立公文書館）。

<sup>3</sup> 《7 蒙匪騷動ニ関スル報告》（第壹篇），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93500，〈蒙古ニ関スル事情密偵一件〉（B-1-6-1-46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柳勝敏<sup>1</sup>等人前往巴布札布處考察，青柳勝敏在與巴布札布約定進行援助之後於12月底返回了日本。<sup>2</sup>

而1916年3月27日奉天滿州鐵道公所報告稱，當時到北京出差的滿鐵職員得知，瑪哈爾巴薩爾回到北京後報告說：“巴伊如國王般地接受部下禮拜，一身霸王之氣，其部下中既有擅長文筆的漢人，還看到有數名日本人各自攜帶妻子居住於此。據巴本人所談，已經同日本進行談判，當會接受其提供的武器與軍費，但武器如利用滿鐵運送自然有被支那官憲發現的危險，因此同東清鐵路進行交涉，準備在浦鹽登陸後運送到滿洲里的停車場，在當地進行交付。”<sup>3</sup>從此時間上可以判斷，在此之前已經有當地的日本馬賊、也許就是薄益三等與巴布札布建立了聯繫。現藏於日本防衛研究所、由當時青島日本守備軍司令官大谷喜久藏於1915年給陸軍大臣的〈軍官處刑〉報告證實，薄益三在1915年初即已經帶領其弟薄守次等15名日本人（其中有日軍軍官），開始為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準備軍火武器：“薄益三在1915年1月下旬受宗社黨頭目趙贊天和于海川的指令，以復興清朝為目的，在黃縣（青島一筆者）地方發起革命之亂，……前往大連並在當地購買步槍一百七十支，子彈四萬發。”<sup>4</sup>宗社黨在青島發起革命一說，應該是青島軍方沒有搞清事實而產生的誤解。

在日本政府改變了對袁政策以後，大量的日本現役和退役軍人、以及日本大陸浪人進入到“滿蒙”地區，分別形成了旅順的總部（肅親王和川島浪速）和巴布札布軍中的指揮部（以陪着肅親王第七子完奎來到這裡的青柳勝敏為首）。按照《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所列的名單，僅在巴布札布軍中的日本人就達51人之多（其中22人為預備役軍官），肅親王變賣財產通過川島浪速等人在日本購買的軍火也經由這些日本人之手陸續運送到了巴布札布軍中。<sup>5</sup>由於第廿七師師長張作霖態度不明，為了排除障礙，日本浪人們於5月27日組織了對張作霖的自殺性襲擊。但是內田良平在6月1日從沈陽給外務省發去電報，又建議“由張作霖提出，將長城以外即滿蒙地區從中國分離出來，在宣統帝統治下獨立。”<sup>6</sup>

1916年6月27日巴布札布軍打出了“勤王師扶國軍”的旗幟，7月1號開始南下東進。然而，按照中間立夫的見解，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注定不會打贏的戰爭。因為巴布札布之所以出兵，不過是因為自己突然遭到日本拋棄，而對日本做出的一種示威行動。<sup>7</sup>因為護國戰爭迅速得到全國各地響應，袁世凱雖然被迫於3月21日取消了帝制，但是反對袁世凱的呼聲卻沒有因此消停，失意的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突然死去。日本政府因此宣布支持黎元洪新政權，在中國剛剛開始的倒袁運動因此又被日本政府再次緊急叫停。面對巴布札布的軍事行動，日本政府只好嚴令當時在旅順的川島浪速趕往前線郭家店（今天吉林省梨樹縣境內）親自迫使巴布札布退兵。10月6日，退兵途中巴布札布軍與一直跟蹤追擊的熱河都統姜桂題<sup>8</sup>帶領的毅軍遭遇，巴布札布本

<sup>1</sup> 關於青柳勝敏當年幫助孫中山在東京建設軍事學校「浩然廬」的過程，請參見趙軍：〈辛亥革命をめぐる日本民間の動き—青柳勝敏をはじめとする軍人グループの活動を中心として〉，王柯編：《辛亥革命と日本》（東京：藤原書店，2011年）第54-80頁。

<sup>2</sup> 〈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上），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第627-630頁，625頁。

<sup>3</sup> 〈奉天滿州鐵道公所開申蒙匪頭目巴布札布懷柔策ニ對スル政府ノ苦心ノ件〉，大正五年三月二十七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4018113300，公文雜纂・大正五年・第三十九卷・建議・建議（國立公文書館）。

<sup>4</sup> 〈將校處刑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3022383300，《密大日記》大正4年4冊の内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sup>5</sup> 〈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上），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第631-636頁。

<sup>6</sup> 〈1 內田良平發電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71600，《支那政見雜纂》，第二卷（B-1-1-2-15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7</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217頁。

<sup>8</sup> 〈第九號 / 巴布札布部下招撫ニ関シ八月二十五日姜桂題氏ヨリ中央政府ニ送レル電報〉，JACAR（アジア歴史

人也中流弹身亡。

不仅如此，此后日本外务省还通过军方，反复命令参加了这次行动的日本人迅速脱离“蒙匪”乃至“宗社党”。<sup>1</sup>“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再次收场。中间立夫从巴布札布的生涯和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对于巴布札布所追求的根本不是“满蒙独立”的结论：“对于他来说，只有内蒙古的独立，才是第一义的问题”。<sup>2</sup>第一次和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中的蒙古族，都只不过是川岛浪速当做了实现“满蒙独立”的工具。而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川岛浪速所醉心的“满蒙独立”及其所发动的这两次“运动”，对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来讲，也不过是他们干涉中国的一个工具，一颗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而已。

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虽然消失了，但是参加过“运动”的日本人却并没有将对“满蒙”纳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放弃幻想。直到1925年时薄益三等人还留在赤峰和林西一带，但是这时他们却是借着和蒙古王公合办农牧业开发产业的口号在活动。<sup>3</sup>日本当年对“满蒙”地区产生兴趣的原因就是向这里移民和开发这里的矿产资源，在1910年时就有日本人到“吉林蒙古一带查勘一切，籍近侦探。”<sup>4</sup>中井喜太郎在他于1913年12月15日个人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过一份《关于满蒙之意见》，为日本政府设计了“矿山开掘权获得案”、“森林伐采权获得案”、“南满铁道事业扩张案”和“东蒙古王公怀柔案”等纳满蒙进入日本势力范围的方法，而其中的《东蒙古王公怀柔案》就是针对东部蒙古地区的荒地开垦权和矿山开采权：共和以后，东蒙古王公因为失去了清朝时代的经济补助而财政贫乏，王公们羡慕朝鲜国王每年能够从日本得到巨额的补助，因此也曾派人暗地调查金州半岛（辽州半岛）的中国人生活情况，希望能够以荒地开垦权和矿山开采权为抵押，藉助日本势力保全王公地位和得到能够安泰生活的补助费，而在北京的日本人其实已经以荒地开垦权和矿山开采权为抵押向其贷款，所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在满洲的日本银行对他们进行贷款。<sup>5</sup>

其实东蒙地区的蒙古王公们很早以前就有以土地作抵押以换取日本支持的想法，所以，但年川岛浪速所说的“与巴林王之间以其管辖内的矿山开采权为抵押借款一万两”，“与巴林敖汉等昭乌达盟十一旗之间签订特殊密约之事已经接近成功”的说法绝非是空穴来风。1914年4月敖汉旗苏亲王与日本人的谈话中也直接说出了这一想法。<sup>6</sup>1915年5月11日，“十年以来蒙古巴林王教习”（原文如此）的片谷传造搭乘“哈尔滨号”回到日本，在神户登陆时对记者们谈到：“本次日支交涉中如何获得在东蒙地区的利权是我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但是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该地区与其说是资源丰富，毋宁说是在国防上处于最为枢要位置，所以为了国家百年之计和建设东洋和平之根基，即使放弃一些山东方面的利权也必须要收入我手。同时，该地资源之丰富可谓别无可有，只要政府如当年东拓（即以移民和殖民地开发为主要内容的“东洋拓植”——作

---

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130394100, 《外事彙報》，大正5年度(B-政-8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1</sup> 〈宗社党及至蒙匪關係邦人取締に関する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03022426000, 大正6年《密大日記》, 4冊の内4,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蒙匪中より日本人引揚方説論の爲め海拉爾出張に関する復命書進達の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3022426100, 大正6年《密大日記》, 4冊の内4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sup>2</sup>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2013年), 第219頁。

<sup>3</sup> 《蒙古農牧事業關係雜件》第一卷〈6. 博王府対中日農業及商事合弁經營ノ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1157600, 《蒙古農牧事業關係雜件》, 第一卷(1-7-7-00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4</sup>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全宗》〈日本在長春府城內秘設關東都督府派出所並有日人至吉林蒙古查勘偵探希酌辦見復由〉, 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四字三百六十號。

<sup>5</sup> 〈中井喜太郎ノ滿蒙ニ関スル意見〉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500, 《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B-1-1-2-15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sup>6</sup> 〈秘第一八号, 谍第五百六十二号〉, 5 大正3年2月24日から大正4年8月28日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169300《各国内政關係雜纂》/支那ノ部/蒙古 第三卷(B-1-6-1-140)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者)那样设立特别设施进行开发,或者是补助有志的资本家着手此类事业,现今一平方海里人口只有两人的这片土地,吸收500万人的移民也并非难事。何况,这里的人即使对我们还没有产生感情,也绝不会像他们对待支那人那样坏,事业定能顺利起步和发展。”<sup>1</sup>

片谷之所以敢于说出这种话来,说明他明白蒙古族王公的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借日本力量摆脱中国的目的。对于这一点,民国政府当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民国九年,即1920年6月时他们借着一封顺直省议会的电报开始大做文章:“天津顺直省议会来电,民国九年六月二日大总统国务院钧鉴,近闻蒙古王公私借日债,擅以蒙地做押,事如属实,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务恳严为查究,以弭外患。”<sup>2</sup>

这件事当然绝非小事。国务院将这件事立即交给了外交部。<sup>3</sup>但是外交部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却很蹊跷,他们以无法得知“债券方面究系何等日人”为名,不去向日本方面直接提出交涉,而是将此事又推给了内务部和蒙藏院:“惟上述消息,关系土地主权,至为重要,极应设法侦查,如果属实,应即劝令蒙古王公迅速取消此议,以免发生重大轆轤。”<sup>4</sup>内务部在借到国务院的命令后,6月25日特地发文:“查顺直省议会电称各节,关系我国土地主权至巨,极宜切实查明,如确有押借情事,即饬赶紧取消。一面对于蒙属各处更应一体严行晓谕。不得再有此种行为,以免酿成巨患。”<sup>5</sup>从国务院发给外交部的〈国务院公函第一千七百八十五号〉来看,到了8月时,他们已经察觉蒙古王公确有此类行为,且目标渐渐集中到了昭乌达盟。<sup>6</sup>然而有趣的是,这件事情到了最后,被推到了当时担任蒙藏院总裁的贡桑诺尔布的面前。贡桑诺尔布虽然不是来自昭乌达盟,但是昭乌达盟的巴林旗、敖汉旗的王公却都是当年在他的率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盟友,而他们当年也正是以农地开垦权和矿山开采权换取了日本支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聪明的贡桑诺尔布,立即行文回答“由本院照会昭乌达盟长,严密侦查,无稍回护,如果属实即应赶紧取消。”<sup>7</sup>民国政府如此做法固然有其理由,然而是否同时还有其他的目的,明眼人当是不言自明:当年日本与蒙古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远非是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这样一句话就能够完全说清的。

## 结 语

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日本政府和日本占领当局从来就没有过统一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使其实现独立的打算。森久男指出,满洲事变之后东部内蒙古地区曾经出现了要求内蒙古独立的活动。甘珠儿扎布和正珠儿扎布建立的“蒙古独立军”一时还得到了关东军的支持,领取了3000支枪支和20万发子弹,其后又以本文前边提到的松井清助(此时为退役大佐)等为顾问。在1932年

<sup>1</sup> 〈東蒙に移民せよ〉,《大阪朝日新聞》,1915年5月12日。

<sup>2</sup> 〈蒙古王公私借日債事〉(發文者國務院,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91-04-015,民國9年6月(1920年6月)。

<sup>3</sup> 〈蒙古王公私借日債以蒙地作押〉(發文者國務院,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4-010,民國9年6月(1920年6月)。

<sup>4</sup> 〈蒙古王公私借日債應設法偵查如果屬實即勸令取消此議〉(發文外交部,收文者內務部、蒙藏院),《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4-011,民國9年6月(1920年6月)。

<sup>5</sup> 〈蒙古王公私借日款事〉(發文內務部,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1-015,民國9年6月(1920年6月)。

<sup>6</sup> 〈准色旺紮布等電稱報載熱屬蒙古王公暗將昭盟荒地私賣決不承認等語函送查核〉(發文國務院,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1-016,民國9年8月(1920年8月)。

<sup>7</sup> 〈蒙古王公私借日債事已照會昭烏達盟長嚴密偵查如果屬實應即取消〉(發文蒙藏院,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1-017,民國9年8月(1920年8月)。

3月的满洲国成立前夕，内蒙古东部的蒙古族中还有人提出了分别建立满洲与蒙古两个国家，然后由两个国家共同构建成“满蒙独立国家”的建议。然而由于担心在新国家——“满洲国”内引起民族对立，“2月18日，在（满铁中数一的蒙古研究家，满铁郑家屯公所长）菊竹实藏的指导下，在郑家屯召开了东部内蒙古各旗代表会议，通过了东部内蒙古的蒙古族参加新国家的决议。”“‘蒙古独立’被降为‘蒙古自治’。作为满洲国建国理念的‘五族协和’并不单单是一个美丽的辞藻，其实包含着否定蒙古族独立的深意。”<sup>1</sup>

被并入了满洲国的内蒙古东部，最后不过是成了满洲国的兴安省。而针对热河省内的蒙古族的动向，关东军参谋部在1933年10月26日的报告书中还在指出：“热河省内的蒙古人知识分子中有认为将蒙古民族联合在一起实现蒙古独立，这一点应该引起吾人注意。”“如果不客气地说，蒙古人只要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会高兴地服从。”当年的9月8日和9月11日，在承德的日军师团司令部会议室里，先后由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和热河省公署主持下召开了“蒙古王会议”，并形成了〈热河省蒙旗会议决议〉，其中第一条即为：“一，热河的蒙民为构成满洲国之一分子，永久对满洲国尽忠节。”<sup>2</sup>

1936年1月，由“锦州省公署旗务课”五岛德二郎写给军方的一份政策提案报告〈关于热河省、锦州省管下蒙旗处理的考察——处理蒙古根本方针考〉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如果蒙古工作妨碍了支那工作，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应该被放弃。”“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到『支那工作』、『支那四亿工作』当然要包括察哈尔。或者是谈到支那主权，那么支那的主权究竟是指什么呢？单从文字上来看，这一点就非常抽象笼统。主权是复兴亚细亚运动至高无上的内容，做到了这一点就等于说已经取得了亚细亚的复兴，因此主权论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现实论，所以将蒙古工作作为牺牲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此谁都不会提出异议。”<sup>3</sup>也就是说，包括当年的“满蒙独立运动”在内，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所有工作，说到底不过是为进一步侵略整个中国的目的而服务的。

---

<sup>1</sup> 森久男：〈蒙古獨立運動と滿洲國興安省の成立〉，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現代中國》第73號，第102—106頁。

<sup>2</sup> 〈閔蒙報第78号 熱河省より見たる蒙古民族に就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468400，熱河省より見たる蒙古民族に就て(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sup>3</sup> 〈熱河省、錦州省管下蒙旗処理ニ関スル一考察——蒙古處理根本方針考〉4. 国外蒙古獨立論(チャハル蒙古獨立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21529900，熱河省錦州省管下蒙旗處理に關する一考察—蒙古處理根本方針考—，康德3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论 文】

# 二重的中国

——1930年代的新疆问题与近代国家的“边疆”意识<sup>1</sup>

王 柯

进入193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讨论和研究“边疆”问题的热潮，它标志着中国19世纪下半叶以来所面临的“边疆危机”在30年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需赘言，这与9·18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有着直接的关系。<sup>2</sup>本章的目的，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疆内部和外部形势为背景，通过分析当时中国政府关于新疆政治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和和中国知识界就新疆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探讨近代中国有关边疆思想和“边疆危机”的发生机制、构造性原理和性质，并从地政学的角度考察日本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渗透对中国国民强化近代国家“边疆”意识的作用，进而从这些围绕着“边疆”所发生的具体行动和思想中，发现在近代民族国家条件下中国传统国家意识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意义。

### 1. 二十世纪初期新疆的政治独裁体制与“新苏关系”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当时的新疆省首府乌鲁木齐曾经先后发生过两次政变，导致了新疆最高权力的交替。在1928年7月7日的政变中，新疆省省长兼新疆边防督办杨增新被军政厅长樊跃南暗杀，负责镇压政变并杀害了樊跃南的新疆民政厅长金树仁随后就任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1933年4月12日，参谋处长陈中等人策划政变，将金树仁赶出新疆，新疆省政府军东路军总指挥盛世才登上了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

有人指出，新疆最高权力的交替，“历来都是通过‘藩镇政变’的形式来实现的”。<sup>3</sup>因为从杨增新到金树仁，再从金树仁到盛世才，新疆政权的两次交替，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插手其中，只是无奈地在事后予以追认，补上一道手续而已。这种政权交替的性质，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杨增新时代（1912—1928年）和继杨增新之后的金树仁时代（1928—1933年），新疆省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性质。事实上，在进入中华民国时期以后，新疆的最高统治者杨增新、金树仁，一直保持了在政治上的独立。<sup>4</sup>

然而应该看到，这种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政治上独立的局面，并不仅仅是由地方军阀人为造成的。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由于中央政府无力在财政上对新疆进行支援，新疆在经济上对中国内地的依赖程度也大大下降。与中央政府和内地相对独立的新疆经济和财政体系的形成，在客观上造成了新疆省政府在政治上对中央政府依存度的下降，支持了新疆省当局在政治上的独立。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由清王朝中央政府拨给或从各地调拨、被称为新疆

<sup>1</sup> 本文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历史认识》第七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231—264页）。

<sup>2</sup>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林恩显编：《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国立编译馆主编，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91—113页，原载《边政公论》第一期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sup>3</sup> 吉人：《今后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4年二卷21期），第3页。蒋默掀：《新疆政变又揭开一幕》（《时事月报》1933年九卷二期），第62页。

<sup>4</sup> 关于“政治的独立”一词，参照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第99页。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神近市子訳、岩波書店，1940年、第12頁。蔡锦松、蔡颖：《1933年南京国民党和盛世才争夺新疆统治权的斗争》（《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一期），第72页等。

财政命脉的每年大约 300 万两的补助金（协饷）突然中断。<sup>1</sup>杨增新不得不在当地采取增税、大量发行纸币、振兴实业、开垦农地、整治地方贪官污吏等手段，在建立以自力更生为目标的新疆财政体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sup>2</sup>但是，由于军事预算庞大，<sup>3</sup>新疆省政府一直没能摆脱巨大的财政赤字。到 1922 年，根据当时的统计可以得知，新疆每年的财政支出都远远超过了财政收入。<sup>4</sup>

在这种情况下，杨增新于 1920 年重开了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贸易。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即所谓新苏贸易，从 1923 年起飞速成长，在新疆建设独自の财政体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sup>5</sup>也有人从苏联的经济侵略这个角度来论述新苏贸易。<sup>6</sup>但是很明显，新苏贸易不应该简单地看作是单方面的经济侵略。因为，新疆省政府将新苏贸易看作一个确保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积极参与并且推进促成了此事。

从俄国革命到 1920 年之间，杨增新曾经禁止过新苏贸易。杨增新在 1919 年 7 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到了禁止新苏贸易的理由在于，与帝俄俄罗斯之间尚存在着不平等条约。“条约改正之前，再开通商的话，对地方政府来说，实际上是利少而害多”。其利害在于，“彼进我境准暂免税，我进彼境则课以重税”。<sup>7</sup>1920 年 5 月 28 日，杨增新派伊犁道尹许国祯作为代表与苏联方面签订了《中俄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这个被称为“中苏（俄）间第一个平等条约”的协定，废除了过去俄国商人所享有的关税免除及治外法权。<sup>8</sup>杨增新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新苏贸易来增加关税收入，以贴补新疆的财政。实际上，关税收入很快就成了新疆省政府的最大的收入来源，其数额甚至占到了年财政收入的 23%。<sup>9</sup>

新苏贸易再开之后，其贸易总额年年递增，很快就超过了新疆与中国内地、印度、阿富汗的贸易额。以 1927 年为例，新苏贸易总额为 27,410,000 卢布，而与此相对，新疆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仅为 2,509,000 卢布，还不足新苏贸易的十分之一。当年，新疆与印度的贸易总额为

<sup>1</sup> 据齐清顺的文章介绍，清朝每年给新疆的补助金约二百五十万两（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新疆历史研究》1985 年一期，第 64—65 页）。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曾一度全部取消了对新疆的补助。从 1913 年开始，中央政府又决定给新疆财政每年补助银元六十万元，但由于内乱的缘故，这项补助也曾数次中断（陈延祺：《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一期，第 100 页。陈慧生：《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财政金融》《新疆历史研究》1985 年三期，第 97—99 页）。

<sup>2</sup> 关于杨增新的财政政策，有很多论文。这里主要参照陈延祺和陈慧生的论文，以及黄寿慈：《处理新疆事变刍议》（《新亚细亚》1934 年七卷四期，第 21 页）。

<sup>3</sup> 1917—1922 年的新疆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平均占 74%（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地方志委员会版，第 687 页；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新亚细亚》1934 年八卷二期，第 39 页）。

<sup>4</sup> 新疆省 1917 年的财政收入为 4,745,800 元，而当年的财政支出为 12,876,647 元；1922 年的财政收入为 7,480,124 元，当年的财政支出为 52,374,646 元（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9 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 686—688 页）。

<sup>5</sup> 只有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主席褚民谊认为，杨增新政权之所以能解决财政困难并存续下来的原因，就是得益于来自新苏贸易的关税收入及打击地方官吏的贪污（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3 年三期，第 84 页）。

<sup>6</sup> 将新疆与苏联间的贸易称为苏联的经济侵略的论文有很多，如：李钦文：《新疆之经济状况》（原文《新亚细亚》，1932 年四卷二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历史资料集》五，第 901—911 页）、慕宁：《苏联与新疆的商业关系》（《新亚细亚》1933 年六卷五期，第 41—50 页）、罗君素：《苏联与新疆的商业关系》（《新中华杂志》1934 年二卷十八期，第 29—34 页）、庄心在：《新疆与苏俄之关系》（《新亚细亚》1933 年六卷五期，第 25—30 页）、曾问吾：《苏联对新疆的经济侵略》（《新亚细亚》1934 年七卷二期，第 49—54 页）、张觉人：《新疆与苏俄之贸易》（《天山月刊》1934 年一卷一期，第 35—50 页）、王飞：《新疆商业之危机及其补救的方策》（《西北向导》1936 年二十号，第 387—391 页）、王醒民：《新疆之商业与金融》（原文载于《新亚细亚》1935 年十卷四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历史资料集》五，第 601—625 页）、赵殿浩：《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新亚细亚》1934 年七卷六期，第 35—51 页）等。

<sup>7</sup> 该发言载于民国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收国务院交抄杨增新咨呈》。参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新疆边防》1960 年，第 241—242 页。

<sup>8</sup> 新疆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新疆对苏经贸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64—265 页。

<sup>9</sup> 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9 页。

4,001,413 卢布；与阿富汗的贸易总额为 885,040 卢布。<sup>1</sup>在中苏贸易总额中，新苏贸易额所占的比例也日益上升。新苏贸易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上升的趋势，应该说也是新疆省政府支持的结果。<sup>2</sup>

《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对新疆从苏联进口的商品数量不作任何限制，也未规定征收关税的原则。另外，还允许苏联的国家商务机关在新疆全域设立代理人（协定第三条）、允许苏联银行在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商业中心城市设立派出机关（附件第二条）。<sup>3</sup>因此，有人批判它是一个“丧权辱国”性质的“密约”。<sup>4</sup>

新苏贸易关系的加强，使新疆省政府在财政上减轻了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它进而导致了中央政府对新疆政治影响力的下降。根据 1924 年 6 月以《中俄伊犁临时通商协定》为基础签订的《新苏暂定通商条件》，新疆省政府和苏联分别在对方领内设立了四个领事馆，<sup>5</sup>此外，还详细制定了一些关税方面的规定。<sup>6</sup>1931 年 10 月 1 日，甚至发生了以下事情：金树仁为了从苏联购买武器，未经与中央政府商量，就与苏联秘密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定》。<sup>7</sup>

新疆“物产虽然丰富，制造只能依靠外国”。<sup>8</sup>这种落后的经济现状，决定了新苏贸易主要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即用新疆的农畜产品交换苏联的工业制品。<sup>9</sup>但是，新疆与印度、新疆与阿富汗之间的贸易内容则完全不同。<sup>10</sup>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棉花大量出口苏联的现象。棉花生产是新疆农业的重要部门，<sup>11</sup>由于苏联从新疆大量进口棉花，并通过中介人<sup>12</sup>向棉农支付预付款，<sup>13</sup>可以说当时的新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到苏联的经济生产体系之中去了。

新疆的工业商品市场，也基本上被苏联商品独占。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新疆与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中国内地生产的商品经过流通领域到达新疆后，价格昂贵，超过了苏联的商品。当时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途径共有三条：一是从兰州经过哈密到乌鲁木齐，全长为 1320 公里；二是从绥远经过内蒙古、宁夏到哈密，全长为 2950 公里；<sup>14</sup>三是从北京经过内蒙古、外蒙古到北京。但是其间“不仅没有一条铁路，甚至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sup>15</sup>新疆与中国内地之间隔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从新疆前往内地，途中甚至需要四个月的时间。<sup>16</sup>内地与新疆之间的空中航路，于 1932 年 12 月才首次开通，从 1933 年 5 月开始，才开始有了每月一个往返的定期航

<sup>1</sup> 李寰：《新疆研究》重庆安庆印书局，1944 年，第 155—159 页。

<sup>2</sup> 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8 页。

<sup>3</sup> 参照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时事月报》1935 年十三卷二期，第 74—76 页。其它转载于《新疆苏俄商约之暴露》（《国闻周报》1933 年十卷三十八期，作者不详）附录。

<sup>4</sup> 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8 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 37 页、陈言：《新疆俄英日三国角逐之形势》（《西北论衡》1937 年五卷六期），第 8—9 页。

<sup>5</sup> 刘德恩：《驻苏联新边五领事馆初期概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三，1979 年），第 180—200 页；柴恒森：《抗战前中国驻苏五领事馆概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二十二，1987 年），第 76—84 页。

<sup>6</sup> 新疆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新疆对苏经贸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66—267 页。

<sup>7</sup> 无名氏：《新疆苏俄商约之暴露》（《国闻周报》1933 年十卷 38 期附录），第 1—2 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 40 页。

<sup>8</sup> 慕宁：《苏联与新疆的商业关系》，第 48—49 页。

<sup>9</sup> 《新疆问题之认识》，天津《大公报》1934 年 7 月 6 日社论。

<sup>10</sup> 興亜院政務部：「ソ聯の觀たる新疆事情——新疆のソヴェート化に就いて」（1940 年）第 93 頁；李寰：《新疆研究》第 154—157 页。

<sup>11</sup> 关于 1927 年的新疆农作物种植面积，参照李伯藩：《最近新疆之经济形势》（《新亚细亚》1933 年五卷三期）。

<sup>12</sup> 该词为笔者自造。这些人受雇于从事新俄贸易和新苏贸易的贸易商，为确保棉花的收购量，他们在播种之前就与农民签定契约，并为农民提供一部分生产资料和资金，以促使农民从事棉花生产。

<sup>13</sup> 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新亚细亚》1933 年五卷五期），第 94 页。

<sup>14</sup> 李寰：《新疆研究》，第 90—91 页。

<sup>15</sup>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第 99 页。

<sup>16</sup> 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8 页；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第 48 页。

班。但是就在当年9月，新疆省政府又借口与马仲英的战争，将这唯一的航班也关闭了。<sup>1</sup>

交通的不便，不仅严重影响了商品的流通，也使中央政府的政治影响力大大下降。中国的旅行者从内地到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般需要四个月的时间，而苏联却拥有着通往新疆的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1930年苏联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从这条铁路的特力力车站，到新疆的边境城市伊犁仅仅只有265公里，乘汽车也是数小时便可到达。从那里乘汽车两天即可到达乌鲁木齐。<sup>2</sup>当时中国人也常常利用这一路线，经由苏联前往新疆。这条铁路的建成和使用，让许多人都有了戒备心理。孙荣元指出，“交通是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最有利的工具”、<sup>3</sup>海维谅的“哪个国家拥有了通往新疆最便利的交通条件，它就在新疆拥有了最强的势力”<sup>4</sup>等言论，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对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评价。很多人注意到了铁路给新疆带来的影响，<sup>5</sup>也有人从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等侧面分析了该铁路给新疆带来的不利影响。<sup>6</sup>，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当时就被人屡次指出。也常常有人用“鞭长莫及”一词，形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政治影响力。<sup>7</sup>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随着与地方之间距离的逐渐拉大而逐渐下降，这与历史上中国王朝之所以建设多重型天下构造不无关系。但是，新疆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政治关系，与追求国家、国民等质性的近代国家思想却是大相径庭的。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商品独占新疆市场的现象，并没有受到新疆民众的强烈抵制。有学者分析道：交通的不便“既使中央政府感到难以指挥，也使新疆各民族感到向中央政府传达民情之困难”。<sup>8</sup>但是，对于“中国”国家意识淡薄的当时的新疆各民族民众来说，是否真的就有这种传达民情的愿望呢？<sup>9</sup>根据一位维吾尔族政客的报告，新疆许多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的商人就是在新苏贸易中培养起来的。<sup>10</sup>由此可知，新苏贸易，事实上主要是在新疆与苏联的中亚地区之间进行的，所以它也就比较容易为新疆的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的民众所接受。这也同时说明，新苏贸易关系起到了导致新疆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住民的“中国”意识逐渐淡漠的作用。如果看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有人将“新苏贸易”看作是苏联的经济侵略，日后新疆政治问题的发展也能够说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和内地知识分子从新苏贸易中产生对苏联插手新疆问

<sup>1</sup> 沙秀华：《新疆航空史上的第一条航线》（《新疆地方志》1991年三期），第64页；沙秀华：《新疆历史上的第一个航空站——迪化设站经过》（《新疆地方志》1991年三期），第64页。

<sup>2</sup> 张建勋：《西土铁路对于新疆之影响及今后自保之策略》（《边事研究》1934年创刊号），第92页。

<sup>3</sup> 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天山月刊》1934年一卷四期），第19页。

<sup>4</sup> 海维谅：《国人注意不到的新疆》（《新亚细亚》1934年七卷6期）前述论文，第54页。

<sup>5</sup> 关于这一点，参照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1934年一卷一期，第45页；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新中华杂志》1933年一卷十期，第5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74页、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5页、陈言：《新疆俄英日三国角逐之形势》，第8页、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第20页、曾问吾：《苏联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2—53页、慕宁：《苏联与新疆的商业关系》，第41页、庄心在：《新疆与苏俄之关系》，第28页；葛绥成：《内忧外患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3年一卷十一期，第9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47页、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新亚细亚》1935年九卷二期），第33页、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第93—94页。

<sup>6</sup> 参照刘湛思：《西土铁路与我国西北之关系》（《开发西北特刊》1933年一卷一期），第3—9页；张建勋：《西土铁路对于新疆之影响及今后自保之策略》。

<sup>7</sup> 使用“鞭长莫及”一词的论文有：印维廉：《新疆事变的演化》（《新亚细亚》1933年六卷五期），第39页；记者：《南疆之变》（《国闻杂志》1934年十一卷九期），第2页；吉人：《今后的新疆》，第5页等。

<sup>8</sup> 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上海引擎出版社，1937年），第48页。

<sup>9</sup>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倾向，即过分看重土耳其系伊斯兰教民族（中国这一）国家意识淡薄一事。例如，孙翰文就曾说过：“（新疆的土耳其系伊斯兰）民族文化落后，国家意识淡薄，缺乏自立能力，制造内乱局面，给别人提供可乘之机，甚至侵略的机会”（孙翰文：《新疆民族鸟瞰》（《新亚细亚》1936年十二卷一期，第27页）。

<sup>10</sup> 艾沙：《新俄关系述略》（《边铎》1933年一卷四期）第2页。

题的疑虑和忧惧，并非没有道理。

## 2. 日本因素在新疆“国际化”中的崛起

19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都使用“国际化了的新疆”这一说法，来说明当时围绕着新疆的复杂的国际局势。<sup>1</sup>1933年11月成立于新疆南部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本来在思想上也受到过土耳其、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sup>2</sup>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疆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与英国、苏联、日本等大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sup>3</sup>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驻新疆的总领事馆，设在距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西南1360公里的喀什噶尔。英国人之所以设总领事馆于新疆南部，就是因为那里距印度较近，有非常多的英领印度人以喀什噶尔为据点在新疆南部经商的缘故。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在新疆南部有较强的影响力，并拥有一部分特殊权益。“有很多英领印度人定居于新疆，作为英国臣民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俄国人、德国人、阿富汗人、波斯人等外国人及偶尔从中欧、土耳其或近东来的流浪者则被要求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sup>4</sup>

关于这一点，1935年奉命视察新疆后，经由印度回国的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参事台克满（Eric Teichman）指出：“对于支那土耳其斯坦（新疆——笔者注）的政治体制来说，英国的权益有过大的倾向”。<sup>5</sup>但台克满认为：“英国对新疆的关心，主要在于同印度的通商贸易、在支那土耳其斯坦的印度商人的活动范围、西北国境的安宁以及从支那沿岸进入支那中央亚细亚的英国贸易等等”。<sup>6</sup>对于英国势力在新疆活动的性质，英国人的认识与中国学者的认识之间，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台克满的此次新疆视察，其实带着强烈的国际政治上的目的。1935年6月14日上午，当时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贾德干（Sir Alexander George Montagu Cadogan, 1884—1968）带着台克满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进行谈话，直接提出在迪化设立领事的问题：“苏俄近有垄断新疆商务之势，据报不久即将在迪化设立领馆，本国政府深为焦虑。现正计划派员调查有无在迪化设置领事或商务官之必要，如将来有此必要，而贵国对于苏俄设领之要求予以接受时，希望贵国亦可允许本国在迪化设领。”而徐谟则满口答应：“届时自当予以考虑。”<sup>7</sup>6月29日，英国大使馆参事贺武来到徐谟的办公室，直接提出：“前次贾德干大使会晤贵次长时，曾提及本国政府拟在迪化设领事。现在本国政府已决定拟在迪化设领，推拟先派台克满参事趁其返国之便，前往迪化，调查该处实在商务状况后再行设领之必要。如有必要，希望贵国政府赞成此举并予以便利。”“值此苏俄政治经济力量深入新疆之时，本国政府拟在迪化设领，想亦贵国政府所赞成。”徐谟

<sup>1</sup> 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第44页。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第19页。

<sup>2</sup> 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献有：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39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84页；孙翰文：《新疆民族鸟瞰》，第37页；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第44—45页等。

<sup>3</sup> 明确主张“三十年代新疆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与英苏日三国对新疆的野心有直接关系”的文献很多，本稿主要参照：贺扬灵：《破碎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4年二卷八期）、陈言：《新疆俄英日三国角逐之形势》（《西北论衡》1937年五卷六期）、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新亚细亚》1934年七卷五期），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等。

<sup>4</sup> 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神近市子訳、岩波書店、1940年、第123頁。

<sup>5</sup> 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第123頁。

<sup>6</sup> 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第10—11頁。

<sup>7</sup> 《徐总长会晤英使贾德干谈话记录，时间：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十时，事由：迪化设领事》，《外交部档案》《英人台克满有利新疆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至二十五年四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366.3/0001。

答道：“本国政府根本政策，即在维持开放门户主义。迩来所得新生报告，实有令人感受不安之处。贵国拟在迪化设领，与本国政府政策相符，自极欢迎。”<sup>1</sup>可见英国对苏联在新疆的活动很是在意。

当时的中国学者认为，英国势力在新疆活动的目的，一是要防止苏联势力威胁印度或西藏，二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新疆南部的既得权益而积极活动，欲在新疆南部建立自己的傀儡政权。陈言分析认为，英国势力的具体手法是，煽动民族的独立情绪，制造民族对立的局面。<sup>2</sup>尽管目前尚未找到能够直接证明英国政府与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有着特别关系的资料，但许多人都相信，1933年在新疆南部爆发的“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就是英国人对当地维吾尔居民进行煽动的结果。<sup>3</sup>

毫无疑问，因为与东印度之间的地理关系，英国曾经一度想把新疆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与俄国成为竞争的对手，并且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起就已经开始出现对立。<sup>4</sup>很多中国学者在分析干预新疆的各种外国势力时，都很重视英俄（英苏）对立的性质。然而在他们的口中，苏联的影响力在1920年代以后显然大大超过了英国。一部分人甚至指出，有关英国支持了新疆南部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报道，基本上都是出自于苏联之手。<sup>5</sup>也有人指出，苏联通过它在各地的领事馆在各民族中积极培养亲苏分子。<sup>6</sup>苏联势力渗透新疆的方式与英国不同，英国是在民众的阶层培养反政府人士，苏联则与此相反，它是利用中国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政治野心，帮助他们在新疆构筑一个不得不接受其经济渗透的政治体系和财政体系。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与英国的较量中，苏联能够占到较大的优势。因为苏联可以通过在新疆的苏联国家贸易机构独占新疆市场，在经济和通商贸易方面获得最大的权益和利益。<sup>7</sup>很多文章都提到，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新苏贸易）实际上就是苏联的经济侵略，指出苏联在新疆设立银行和贸易公司，就是苏联进行经济侵略的实例。<sup>8</sup>

中国社会中关于新疆被“国际化”的舆论，1930年代前期多集中于强调“来自苏联的威胁”，以后则是更多地注意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尤其是1935年以后，指出日本觊觎新疆地区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换言之，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孟英庚的《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认为：日本在取得中国东北四省以后，国际形势随之一变，英俄的对日态度立即恶化。日本既要防备英国（的军事行动）、又要着手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同时也是为了

<sup>1</sup> 《徐次长会晤英大使馆贺武参事谈话记录，时间：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地点：政次室，事由：英国拟在迪化设领事》，《外交部档案》《英人台克满游历新疆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至二十五年四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366.3/0001。

<sup>2</sup> 陈言：《新疆俄英日三国角逐之形势》，第10页。

<sup>3</sup> 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41—42页。

<sup>4</sup> 参见王柯：《从满清王朝到中华国家—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与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99期，2007年，40—53页。全文转载于《民族学与社会学通讯》Sociology Ethnicity，第69期，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10年，5—16页。另外，也可以参考拙著《中国，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2014年。

<sup>5</sup> 关于这一点，参照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第45—46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38页、贺扬灵：《破碎的新疆》，第35—36页、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6页、孙翰文：《新疆民族鸟瞰》，第37页等。

<sup>6</sup> 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前述论文，第23页。

<sup>7</sup> 关于这一点，参照曾问吾：《苏联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0—53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74—76页、庄心在：《新疆与苏俄之关系》，第27页、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第41—45页、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第22页等。

<sup>8</sup> 参照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5—6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78页、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5页、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第22页、曾问吾：《苏联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0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40页、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第42页等。

防止中苏两国联合，就开始密切注意英国和苏联的争夺对象——新疆。<sup>1</sup>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之所以认为日本势力已经开始威胁新疆，其背景首先就是，以满洲事变为出发点中日关系起了质的变化。1931年满洲事变以后中国社会中抗日运动思想的高涨，就是产生这种认识的社会根据。

另一个例子是曾廷仲的《列强在新疆势力之分析》。该文分析道：日本的计划是独占满蒙，并将华北划入其势力范围之内。然而，要实现上述计划，就必须侵略新疆，建立起与英国、俄国之间三足鼎立的侵略关系。<sup>2</sup>这里所说的“侵略新疆”，很明显，指的是对新疆进行军事侵略。这种说法，与许多人的“英国和苏联通过对新疆省民众或政府的影响和渗透，图谋对新疆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侵略”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就是说，它要告诉人们，日本带给新疆的威胁才更大更可怕，比起英俄（苏）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对于日本来说，处于亚洲内陆地区的新疆地区的意义，与其说是在中日关系、还不如说是在日俄、日苏关系的背景下而被认识的。日俄战争以后，由于从沙皇俄国手中接过了所谓的“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日本开始与俄国在中国北方地区进行势力角逐，因此与“满蒙地区”相接壤的新疆所具有的战略价值才开始进入日本军国主义的视线里。日本的大陆政策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日本国家的大陆化和经营“满洲”，而“满洲”及其以西的地区日后都是受到苏联“赤化”的地区。<sup>3</sup>直到1930年代之前，日本侵略势力并未直接实际涉足新疆。<sup>4</sup>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可以断定1930年代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新疆的担心完全属于空穴来风，因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的确有企图将新疆也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势力。而这一点到了中日战争时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具体，例如“回教圈研究所”所长大久保幸次，在1939年曾以《作为一个回教研究者》为题，通过东京中央放送局的无线广播以阿拉伯语向中国国的伊斯兰教徒发出呼吁：“在此众多的回教各民族已经觉醒、而为亚洲的再生为目标而腾飞之时，衷心期待诸君也能奋起，与日本人一起为建设东亚地区的和平助一臂之力。”“深深切望诸君遵循防共精神，理解日本圣战的真正意义，与我们一起为东亚的正确的和平建设发挥神圣的作用”。<sup>5</sup>

本书在《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一章论证，当时日本的伊斯兰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而当时日本所称的“中国的回教徒”中，自然包含着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通过日本政府外务省的协调和帮助，日本的“回教研究家”们进行了许多关于新疆政治、社会、国际关系，尤其是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例如日本外务省调查部所编辑的《回教事情》就刊登了许多关于新疆的文章，例如第1卷第2号的《新疆事情一斑》、第2卷第4号的《清初的对回教政策》、《新疆的东部前线“哈密”》和《英国经营新疆的历史与现状》，第3卷第3号的《杨增新的对回教政策》、《清初新疆的燕齐和回屯》即《帝政俄国的新疆经略及特性》等。

<sup>1</sup> 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第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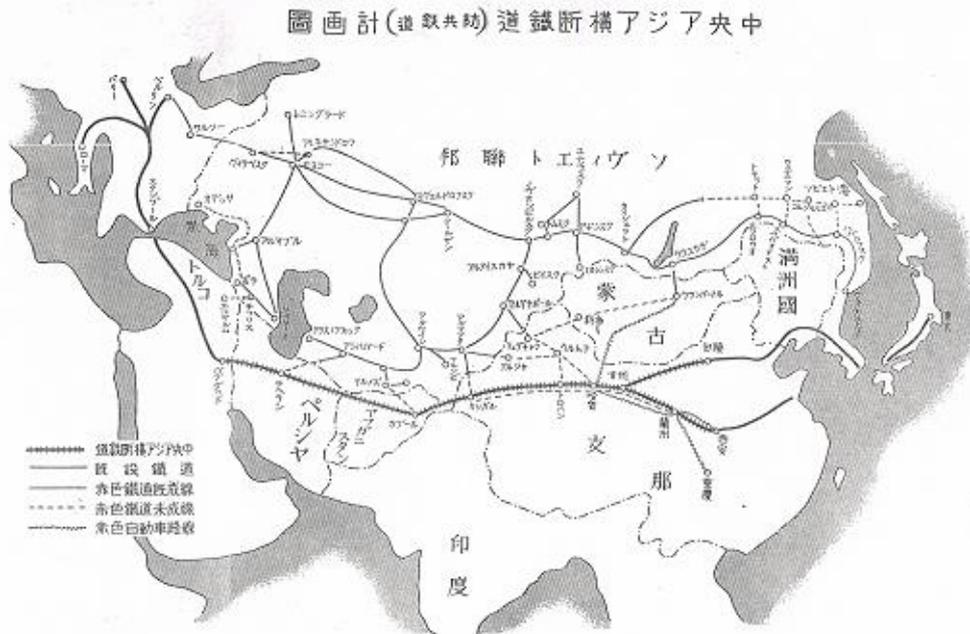
<sup>2</sup> 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82页。

<sup>3</sup> 如：《11 外蒙及新疆の近況 昭和10年3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826900、陸軍省調査班調製史料綴(滿支關係) 昭和6. 11~10. 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又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1327300、第六十四議會用調書、下卷(B-議 OB-2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中的第六章《对「ソヴィエト」連邦關係ヲ中心トスル滿州事变及之ニ關係アル諸問題 / 6、滿州国ト「ソヴィエト」連邦トノ關係》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1327400、第六十四議會用調書 下卷(B-議 OB-2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中的第七章《对「ソヴィエト」連邦關係ヲ中心トスル滿州事变及之ニ關係アル諸問題 / 7、「ソヴィエト」連邦ノ蒙古及新疆方面ニ於ケル活動》。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满洲问题上注意到蒙古（包括外蒙古地区）和新疆的价值，而且将这两个地区并列在了一起。

<sup>4</sup> 关于近代日本向中国新疆地区的渗透，可参见王柯：《东突厥独立运动，1930年代-1940年代》第三章《反日亲苏政策的表与里——盛世才的政治路线与新疆民族问题》，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105-106页。

<sup>5</sup> 大久保幸次：《支那回民諸君に告ぐ》，《回教圈》三卷一号，1939年，第3页，第5页。关于大久保幸次和他的“回教研究所”，参见本书

而在这些研究中，有人提出：新疆（東突厥斯坦）不过是“汉民族的一大殖民地”，<sup>1</sup>因此新疆的伊斯兰居民不仅自然具有亲日与反共的情绪，而且具有清冽的反抗中国中央政府的情绪。<sup>2</sup>以此“研究成果”为立论根据，1939年时有人提议建设一条“防共铁道”——穿越新疆的中亚横断铁路：“这条线路的建设，在避免与俄国势力的激烈冲突并且可以在甘肃省内巧妙地遮断红色通道、援蒋通道，给予在新疆南部地区一直反抗着蒋政权和苏联的压迫，与共产主义进行血腥战斗的孤立无援的可怜的回教徒以光明，将他们变为日本的同伙上，都是一条有益的线路。”<sup>3</sup>



出处：汤本升《中央アジア横断鉄道建設論——世界平和への大道——》，东亚交通社，1939年。

从表面上看来，日本的“回教研究家”们担心新疆的伊斯兰居民受到苏联和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或者是因为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使东亚的安定受到威胁：“今日的支那西北地带，位于蒋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联络要冲的支那的西北一角，如果出现被抗日的回教徒所操纵的事态，就会给东亚的安定带来暗影。正是因为如此理由，我们从兴亚的立场、以及防共的角度出发，对于这片被看做世界的“谜地”而置于片隅的支那的西北边境，不，说是支那但又不是支那的处于半独立氛围包围之中的回疆，必须给予高度注意。”<sup>4</sup>然而事实上，新疆在中日战争时期受到日本政府的伊斯兰研究机关以及日本的“回教研究家”们重视的理由，还是在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胜利、甚至称霸于回教世界的问题：“掌握了南新疆的回教徒就意味着掌握了全新疆的回教徒，抓住了全新疆回教徒的心也就可以抓住全世界回教徒的心。”<sup>5</sup>

日本侵略势力与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之间，的确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然而并不能依此断定日本侵略势力没有插手新疆的企图。1941年的《回教世界》第3卷从第1号到第6号，

<sup>1</sup> 《帝政ロシアの新疆経略との特性》，外务省调查部：《回教事情》3卷3号，1940年，第39页，未注明作者。

<sup>2</sup> 铁道监察官汤本升：《中央アジア横断鉄道建設論——世界平和への大道——》第七章《回々教》，东亚交通社，1939年；马渊修：《抗戦下支那回教徒の動向》，大日本回教协会：《回教世界》2卷8号，第10页。

<sup>3</sup> 铁道监察官汤本升：《中央アジア横断鉄道建設論——世界平和への大道——》，东亚交通社，1939年，第69页。

<sup>4</sup> こばやし・はじめ「回疆」，《回教圈》2卷4号，1938年，89页。

<sup>5</sup> 铁道监察官汤本升：《中央アジア横断鉄道建設論——世界平和への大道——》，东亚交通社，1939年，第69页。

连载了脇坂利徳的《新疆独立戦の回顧》的长文，记载了从 1820 年代的张格尔叛乱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东突厥独立运动的历史过程。按照作者的说明，该文是他“以麻木提师长及其多位忠实部下口述的生动体验为经，以笔者本人的研究和收集到的资料为纬而成”。<sup>1</sup>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在哪里接触到这些维吾尔族的，但是由于说明根据麻木提在反盛世才的叛乱失败之后流亡国外的口述的亲身体验而成，所以可能就是在麻木提的代表 1941 年 10 月到上海时主动向日本领事馆报告的内容。<sup>2</sup>该文作者对维吾尔民族的命运表示同情，但是在连载第一期的开头部分即强调：“今天，日本在所占领的大陆地区已经承认长出新芽的新国民政府。为了排除中国共产党的抵抗，我鹰鹫远程空袭赤都兰州。而居住于亚洲干燥地带的五千万图兰民族<sup>3</sup>，与世界四亿的穆斯林（回教徒）之间具有精神的连带，因此有人说能够掌握新疆者即能够掌握亚洲，所以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考虑掌握东突厥斯坦的问题已是迫在眉睫。”<sup>4</sup>

通过保存在日本防卫研究所中的旧日本军方档案，可以看出当年日本军方曾积极开展对新疆的情报搜集工作。例如 1940 年 9 月，多田部队本部曾经提交过《新疆各族之研究》（两部）；<sup>5</sup>1941 年 6 月蒙古军事顾问部又提交了《青海、新疆省方面情况调查书》，他们使用了一位名为“阿布都拉阿奇（アブドラアチ）”的人调查了苏联在新疆开采石油的情况、新疆省的道路和航空线路、电力情况、无线电通信情况、电话通信情况、家畜出口情况、各种政情及军队驻地和具体兵力部署等，又使用了一位名为“祖农·阿希尔（ズノン・アシエル）”的人在甘州调查了从 1941 年 3 月开始的 85 天时间内所通过苏联卡车的数量，我们知道这些苏联卡车都是向中国内地运送援助物资的。而从名字上来看，这两位日本军方的情报人员应该都是维吾尔族人。<sup>6</sup>

日本与流亡维吾尔族上层人物麻木提的接触，也能够说明日本军方和政府的确对将新疆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产生了兴趣。1937 年春天麻木提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后，一度到土耳其与日本驻土耳其使馆取得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察觉到麻木提一直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的印度政府发出驱除令，麻木提在各地日本使馆的帮助下乘坐日本邮轮远山丸途径上海于 1942 年 4 月 1 日来到了日本，之后在东京联系到上海、呼和浩特、印度和中东各地的维吾尔族人，建立了“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思想”的组织。<sup>7</sup>

### 3. 近代国家“边疆”之意义

在镇压了 1928 年 7 月 7 日的政变之后，原新疆省民政厅长金树仁成了新疆新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到 10 月末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没有对金树仁发表“新疆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实际是

<sup>1</sup> 脇坂利徳：《新疆独立戦の回顧》（1），大日本回教协会：《回教世界》第 3 卷第 1 号，1941 年，50 页。

<sup>2</sup> 关于麻木提的代表 1941 年向驻上海日本领事馆报告的经过，参见蒙古军事顾问部调查部：《回疆独立運動の概説》《第 2 章 マフムツドの対日工作の実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98500、回疆独立運動の概説 森川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关于麻木提发动叛乱失败流亡印度一事，参见王柯：《东突厥独立运动，1930 年代-1940 年代》，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年，105-106 页。

<sup>3</sup> 图兰民族，泛指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民族，19 世纪的鞑靼族知识份子提出的泛突厥主义又被称为图兰主义，因为日语、满语、蒙古语、朝鲜语、维吾尔族等突厥民族的语言均属于阿尔泰语系，所以在图兰（ツラン）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时被日本的学界用来为日本侵略大陆辩护。

<sup>4</sup> 大日本回教协会：《回教世界》第 3 卷第 1 号，1941 年，51 页。

<sup>5</sup>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1682700、昭和 15 年「陸支普大日記第 22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sup>6</sup>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08900、青海、新疆省方面情况調査書 昭和 16 年 6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阿布都拉阿奇”报告说新疆省政府命令全疆各地都要挖防空壕，一方日军飞机轰炸；“祖农·阿希尔”在行动中得到了马步芳的帮助，马步芳拜托“祖农·阿希尔”向日本方面传话：他是身不由己才听从重庆方面的命令的。

<sup>7</sup> 蒙古军事顾问部调查部：《回疆独立運動の概説》《第 2 章 マフムツドの対日工作の実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98500、回疆独立運動の概説 森川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追认)。<sup>1</sup>杨增新时代由省长兼任的“新疆边防督办”一职，也一直迟于1931年6月6日才正式任命给了金树仁。<sup>2</sup>通过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谭延闿等人写给广西回族军阀白崇禧的信件，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在内的多名南京国民政府要人在内，都曾经考虑趁此新疆最高权力交替之机，派白崇禧率领军队进入新疆，一举打破新疆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局面。<sup>3</sup>

白崇禧最终也没有能够进入新疆。其原因有二，一是金树仁的拼命反对，另一是中国内战的爆发，桂系军阀当然不愿因新疆问题而分散兵力和精力。<sup>4</sup>如前所述，新疆的政治独立并不仅仅是一个军阀个人权力欲望膨胀的结果，除人为因素外，也有当时国民政府实际上并不具备统治新疆的实力，以及交通不便等客观原因。这些因素，从白崇禧给胡汉民、谭延闿等人的回信中也可以看出。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又发生了由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陈中等人策划的政变。趁此机会，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一度提议以天山为界，将新疆省分成南北两省。这个提案，因为并不能成为一个解决新疆政治独立问题的现实方案而没有实行。<sup>5</sup>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直到1933年7月前，就追认由发动政变者一方推选出来的临时省主席刘文龙和临时边防督办盛世才之事一直不肯松口，而是派参谋次长黄慕松作为“国民政府宣慰使”，率领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庞大的随员团前往新疆，摆出了一副准备接收新疆政权的架势。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收回新疆政治权力的企图，因盛世才实行了坚决的反击——发动“二次政变”、逮捕和杀害了“4、12政变”的领导人以对南京国民政府宣慰使团实行“杀鸡儆猴”而告破产。7月10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在行政院会议上色厉内荏地说到：“中央的新疆政策是：第一，实现外交上与中央政府的统一；第二，实现军事上与中央政府的统一；第三，承认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新的人事任命也以此为条件，任命能执行上述政策之人”，<sup>6</sup>虽然到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发表了对刘文龙和盛世才的任命，但是在对任命新统治者一事上所表现出的态度中，已足以令人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实现新疆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统一的强烈心情。

值得注意的是，“4、12政变”以后，中国大量的学者也踊跃发言，分析新疆发生政治动乱的原因，为打破新疆的政治独立局面而出谋献策。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新疆社会动乱不断的原因，虽然着重点各种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指出了新疆政治的腐败、新疆经济的崩溃、少数民族与中国内地移民的对立、外国势力的介入、因交通不便而处于与内地隔绝状态等问题。<sup>7</sup>他们

<sup>1</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2076页。

<sup>2</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027页。

<sup>3</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011—3018页。

<sup>4</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012—3022页。

<sup>5</sup> 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第29页。

<sup>6</sup> 蒋默掀：《新疆政变又揭开一幕》，第62—63页；印维廉：《新疆事变的演化》，第39页。

<sup>7</sup> 印维廉举了政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这两条；天津的《大公报》及孔祥哲和余贻泽除了政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还举了民族间的对立（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4—46页；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第26—28页；天津《大公报》1934年7月6日社论）；苏大成所举的三条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民族间的对立和经济问题（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第41—42页）；葛绥成所举的三条是外国势力的介入、民族间的对立和交通不便（葛绥成：《内忧外患的新疆》，第7—9页）；吉人、傅筑夫、赵镜元和郭维屏所举均为四条。吉人、赵镜元和傅筑夫举的是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破绽、民族间的对立和外国势力的介入（傅筑夫：《新疆民族问题》《天山月刊》1934年一卷三期，第2—5页；吉人：《今后的新疆》第4页；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新中华杂志》1933年一卷十期，第1—6页）；郭维屏所举的四条是政治的腐败、民族间的对立、外国势力的介入和交通不便（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1934年一卷一期，第45—48页）。黄寿慈等人特别强调了建设从内地到新疆交通线的重要性（黄寿慈：《处理新疆事变刍议》，第22页；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新亚细亚》1933年五卷五期），第94页）。

一致认为，“412 政变”发生的直接契机是新疆的民族间的对立抗争，但民族对立起源于新疆政治的腐败，而新疆政治之所以腐败就是因为金树仁实行独裁。基于这一共同认识，这些学者们几乎一致指出：处理新疆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造新疆的政治，结束新疆的政治独裁状态，组织一个能够服从中央政府的新的新疆省政府。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他们提出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派遣大员论”，一种可以称之为“派遣军队论”。主张派遣中央大员的人们认为：应该派出中央政府要员以“宣抚”为手段，实现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统一。<sup>1</sup>与此相反，主张派遣军队的人们认为：应该派出中央的军队以压力为手段，实现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统一。<sup>2</sup>

“派遣大员论”与“派遣决定论”二者的背后其实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如何解决新疆的民族对立的问题。“派遣大员论”同时主张对当地民族进行“宣抚”，以使民族问题逐渐沉静；“派遣军队论”则明确主张，防止外国势力的介入也是派遣军队的目的之一，而对于民族的对立和抗争，只有通过镇压的方式来彻底解决。例如，孔祥哲就认为：“愚民不知感恩，唯有以法管理”，所以为镇压民族叛乱，应当派军队驻屯于各地。<sup>3</sup>然而，尽管两种意见相左，但是却都普遍认为，要想彻底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最终只有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因此，有人以“民智不开”为理由，主张在新疆整顿学校教育，<sup>4</sup>其目的实际在于从文化上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sup>5</sup>新亚细亚学会提倡“文化的融合”；<sup>6</sup>赵镜元更明确提出，应该对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的子女同时进行汉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教育，以便“冶汉回于一炉”。<sup>7</sup>

从这些学者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如何解决新疆的政治独立的问题。相对而言，民族问题、经济问题、交通问题及外国势力的介入等问题，都被看成为其次的问题。<sup>8</sup>这也许与“4、12 政变”之后新疆处于政治敏感时期有关，但是有一点还是很明确的：当时中国内地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各样解决新疆问题的办法，其性质都是以消除一切可能使新疆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和民族上实现独立的因素，从而加强新疆与中国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以及人与人的纽带联系为目的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所认识到的新疆问题，决不是新疆地域社会内部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按照近代国家的理念所追求的使边疆地区与内地如何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在文化上实现同化、在经济上实现统合，从而保障作为边疆的新疆永久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问题。

那么，对于追求成为一个近代国家的中国来说，处于边陲的新疆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从南京国民政府的要人与学者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新疆的直观认识，首先都是注意到它的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一面。<sup>9</sup>新疆的石油资源，在二十年代就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sup>10</sup>其黄金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也受到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注意。<sup>11</sup>“中国是世界上

<sup>1</sup> 该词为笔者自造词。关于要员派遣论，参照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28页、天津《大公报》1934年7月6日社论、丁道衡：《对于新疆乱事的一个紧急提议》（《独立评论》1933年四十九号）第8页。

<sup>2</sup> 该词为笔者自造词。关于军队派遣论，参照黄寿慈：《处理新疆事变刍议》，第21—22页、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6页；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第96—99页。

<sup>3</sup> 同前无名氏论文，第94—95页；同前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6页。

<sup>4</sup> 印维廉：《新疆事变的演化》，第31页。

<sup>5</sup> 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7页。

<sup>6</sup> 新亚细亚学会：《敬送黄专使赴新宣慰》（《新亚细亚》1933年五卷六期），第2页。

<sup>7</sup> 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5页。

<sup>8</sup> 也有人主张新疆问题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与民族问题无关。关于这一点，参照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4页。

<sup>9</sup> 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3—5页。

<sup>10</sup> 龚学遂：《新疆油矿与世界石油问题》（《学艺杂志》1924年六卷二号），第1—3页。

<sup>11</sup> 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96—97页。

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新疆又是全中国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是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sup>1</sup>有人指出：“（新疆）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在大战期间是我们中国的生命线，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根据地”。<sup>2</sup>

新疆土地辽阔、人口稀少的价值，在于可以用新疆来安置大量的移民，以解决中国内地人口的过剩问题。赵镜元毫不掩饰地指出：“新省又是一个人口宣泄地，……可以调剂内地过剩人口”。<sup>3</sup>学者们以新疆政治独立的历史为鉴，从他们所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都非常重视振兴新疆的经济。他们建议国民政府在新疆采掘地下资源、开设现代化工厂、建设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开垦和扩大农地、保护内地商人的活动等。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中国内地人口移居新疆，看成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sup>4</sup>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褚民谊也在杂志上刊文，就解决“新疆问题”提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设想，其主要内容为：在中央政府内设立专门的“西北建设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中设国道局、劝业局、采矿局、垦殖局等，分别负责处理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交通整备，促成新疆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采掘和利用新疆的地下资源，办理中国内地住民移居新疆等事务。<sup>5</sup>

中国内地人口移民新疆的问题，早在 1933 年“4、12 政变”之前就已经被提出过。<sup>6</sup>例如，1928 年，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就预料二十年后中国内地将会出现人口过剩的问题，他因而主张，为使新疆能够在将来成为内地过剩人口的移居地，从现在起就应该做出打破新疆政治独立状况的努力。<sup>7</sup>一部分人的主张中甚至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移民新疆除了是能够发展新疆的经济以外，同时也是改变新疆住民的民族构成，以求达到一劳永逸、彻底断绝新疆民族问题的办法。<sup>8</sup>到了 1933 年，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罗文干更提出了一个“一箭四雕”的建议：驱使中国内地的服刑者修建由内地通向新疆的道路，在道路开通以后，让服刑者定居于道路沿途并从事农业开垦。这样，除了在建设交通和开垦农业上可以得利以外，还可以净化内地社会，并可以借此改变新疆居民的民族构成。<sup>9</sup>

中国内地人口移民新疆的问题，与其说这是一种“解决新疆问题”的方法，倒不如说是首先是从中国内地利益出发的一种考虑。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内地过剩人口移民新疆，已逐渐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根据 1932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内地农耕地面积减少问题非常严重。每户农家耕种的农地，全国平均为 22 亩，而在南方的湖南省和广东省则只有 12 亩。加上农村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大部分农地被极少数的地主所占有。“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占农村以至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大的不安定因素。<sup>10</sup>1936 年的谢友萍的论文《西北移民问题》，在分析了大量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指出：为了消除中国社会中的这一不安定因素，就有必要不间断地进行移民。

<sup>1</sup> 关玉衡：《新疆民族问题研究》（《凯旋》1948 年三十四期）第 28 页。

<sup>2</sup> 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 年一卷五期，第 48 页。

<sup>3</sup> 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 3 页。

<sup>4</sup> 主张从中国内地向新疆移民的文献非常多。如：蒋默掀：《新疆大局须彻底清理》（《时事月报》1933 年九卷三期，第 90 页）；李大璋的：《整理及开发新疆之意见》（《新亚细亚》1935 年九卷三期，第 73—74 页）；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 97—98 页；黄寿慈：《处理新疆事变刍议》，第 22 页；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 3 页；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 年一卷五期，第 47 页；葛绥成《内忧外患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3 年一卷十一期，第 10 页；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42 页；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第 100 页）等等。

<sup>5</sup> 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 85—99 页。

<sup>6</sup> 于去疾：《新疆屯垦及今后之计划》（《新亚细亚》1931 年二卷一期），第 28—32 页。

<sup>7</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3013 页。

<sup>8</sup> 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 年一卷五期，第 47 页。

<sup>9</sup> 蒋默掀：《新疆大局须彻底清理》（《时事月报》1933 年九卷三期）第 91 页。

<sup>10</sup>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西北向导》1936 年十二期），第 107 页。

20 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的移民，其移居地点基本上集中于北部“边疆”地区。据 1932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全国范围内，每户农家平均占有土地面积最多的是东北地区，黑龙江省高达 103 亩；其次是西北地区，新疆平均每户为 40 亩。此外，未开垦的荒地也数东北和西北最多。由内地移居东北地区的移民，从 1923 年到 1930 年，共计达到 500 万人以上，其中仅 1930 年一年就达一百万人以上。然而，“满洲事变”爆发以后，向东北地区的移民活动基本上全面停止。可就在此时，中国内地又开始出现了大量灾民。因此，向西北地区移民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其重要意义。<sup>1</sup>关于西北移民的意义，曾有人这样解释道：“内地有人满之患，西北有土荒之忧”。<sup>2</sup>当时所说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和新疆省。<sup>3</sup>四省现有农地可容纳的移民总数，据翁文灏的推算大约为 550 万人，其中新疆可容纳 300 万人。四省之中，新疆的人口密度最低，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 0.5 人，未开垦的荒地也有很多，<sup>4</sup>具有接纳大量内地移民的能力。因此，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当时所说的“移民西北”，实际上就是“移民新疆”。

18 世纪以后，由人口增加引起的土地不足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马尔萨斯对于人口问题的论证，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欧洲各国之所以展开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拼命扩张领土，也是以此为背景的。从世界规模来看，土地不足的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有所缓和，然而，中国的人口却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可以说，相比而言，开辟新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来解决人口增加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才是最为迫切需要的，而中国因此将视线投到了“边疆”地区。

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的学者的心目中，中国内地人口迁移到边疆地区，并不仅仅是一个解决中国内地人口过剩的问题，其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充实国防”。<sup>5</sup>这一点，从使用服刑者建设通往新疆的交通线，开垦新疆农业，并进而达到净化内地社会、改造新疆居民民族构成的提案，竟然出自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之手一事之中就能够得知。所以，谢友萍也在其文章中把罗文干的提案称为是“寓军事于农业的军事农业政策”。<sup>6</sup>

“移民实边”这样一个在中国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古老的话题，之所能够在追求近代国家的 20 世纪 30 年代重新焕发出强烈的生命力，毫无疑问，就是因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和学者们都看到了“边疆”在国防上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价值。“开发西北，即所以巩固新疆地位。”<sup>7</sup>那么，新疆在中国的国防上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关于这一点，当时谈论到这一问题的南京国民政府要人和中国的学者们，几乎都援引了当年左宗棠的主张。<sup>8</sup>1881 年，当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向清王朝的皇帝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他认为，在国防问题上西北边疆甚至比东南沿海地区更为重要，为了防止英国、尤其是俄国进一步侵略中国，必须认真重视新疆问题。在左宗棠的率领下，清朝军队赶走了来自于中亚细亚的浩罕地区侵略者阿古柏伯克，恢复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

但正如当时部分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新疆的形势已与清末的左宗

<sup>1</sup>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第 108 页。

<sup>2</sup> 缪其实：《平绥铁路西展问题》（《西北向导》1936 年九期），第 41 页。

<sup>3</sup> 当时的中国西北，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和新疆省这四省；现在所说的西北地区，是除了这四省之外又加入了青海省。

<sup>4</sup>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第 105—108 页。

<sup>5</sup>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第 104 页。

<sup>6</sup>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第 104 页。

<sup>7</sup> 原文为“开发西北，即所以巩固新疆”（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 81 页）。

<sup>8</sup> 引用左宗棠的发言以说明新疆的重要性的文献，仅笔者所见就有：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时事月报》1935 年十三卷二期，第 71 页）；印维廉前述论文，第 31 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 35 页；葛绥成《内忧外患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3 年一卷十一期，第 7 页；庄心在前述论文，第 30 页；李大璋前述论文，第 67 页；苏大成前述论文，第 59 页；孔祥哲前述论文，第 48 页；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 83 页等。

棠时代大不相同，已经陷入于更加复杂的状况之中”。<sup>1</sup>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人对于新疆的认识，当然要比左宗棠的思想更进一步。具体说来就是：尽管继承了左宗棠“中国国防重点在于西北”<sup>2</sup>的思想，但西北的概念自身已经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当年左宗棠所说的西北边疆，所指的仅仅为“新疆”与“蒙古”地区，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学者文章中所论及的“西北”，实际上是“西”加“北”，即从中国东北部的“满洲”，经过北部的蒙古、西北部的新疆、最后直到西部的西藏，已变成了一个包括了上述四个地区的概念。然而，由于从地理上这四个地区完全环绕着内地，所以关于“边疆”的内涵、尤其是“边疆”在国防上的价值，很难说南京国民政府与学者们超越了当年左宗棠的认识。

关于在国防上这四个地区的相互关系，顾季伦指出是“唇齿相依”。<sup>3</sup>很明显，当时国人把这四个相互连接的地区、即西北“边疆”，仍然看作是一道保卫中国内地不受来自西边和北边的外国列强侵略、威胁的屏障和堤防而已。而在这道由“边疆”构成的屏障和堤防当中，新疆之所以备受重视，就是因为它处于东北与蒙古相接，西南与西藏相连这样一个中心位置。<sup>4</sup>然而，当时“满洲”已经完全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外蒙古又进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藏也事实上处于一种政治独立状态之中。随着对上述三个地区实际控制权的丧失，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不仅成为中国内地移民的唯一去路，也成为中国内地可以用以躲避遭受外来势力直接侵略的重要地区，“一旦失去新疆，中国也就要面临危险”，<sup>5</sup>历史从未象当时这样赋予新疆如此重要的意义。<sup>6</sup>而这种意义，却完全是按照服从于中国内地利益的“边疆”的意义上所理解的。

## 结语

何为“边疆”？在1930年代中国国民的心目中，“边疆”其实并非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吴文藻当时曾经进行过整理，他指出：“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例如中国现在的国界，三面是陆界，一面是海洋界。故高长柱对边疆所下的定义有云：‘凡国与国之间标示其领土主权之区别者，曰“国防线”；接近“国防线”之领域，即边疆也。’”（见《边疆问题论文集》，第1页）。这显然是政治上的边疆观。又胡焕庸所著国防地理与国防诸书，则代表地理上的边疆观。“通常称边疆为‘塞外’、‘域外’、‘关外’，而称内地为‘中原’、‘腹地’、‘关内’。二者相对者言，亦都代表了政治及地理的观点。然而国人另有一种看法：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是国界，而并不被视为边疆，反之，甘青川康，地居腹心，而反被成为边疆，这明明不是国界上的边疆，而是指文化上的边疆。”<sup>7</sup>

从吴文藻的解释中可以知道，所谓“边疆”，其实也就是文化上具有差异的“少数民族”地区。关于少数民族与中国国家之关系，当时就有人指出，因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占中国国土面积的70%，因此，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国体来说，少数民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sup>8</sup>南京国民

<sup>1</sup> 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第44页。

<sup>2</sup> 例如，胡汉民说：“中国国防在北不在南”（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012页）；谭延闿说：“中国国防在西北而不在东南”（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013页）；白崇禧说：“中国国防，重在西北”（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015页）等。

<sup>3</sup> 顾季伦：《整理新疆刍议》（《新亚细亚》1936年十一卷三期），第13页。

<sup>4</sup> 关于新疆在中国边境地带占有地理上的中心位置这一认识，参照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新亚细亚》1935年九卷二期）第33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71页、顾季伦前述论文，第13页、孙翰文：《新疆民族鸟瞰》，第27页等。

<sup>5</sup> 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第28页。

<sup>6</sup> 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1页；吉人前述论文，第4页。

<sup>7</sup>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林恩显编：《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国立编译馆主编，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204页，原载《边政公论》第一期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sup>8</sup>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第5页。

政府的大员更加直接地说道：中华民国的国体应该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因此，没有了满族、蒙古族、藏族及回族等少数民族，中华民国这个“中国”也就不复存在。<sup>1</sup>从这里可以看出，包括许多国民政府的要人在内，在当时许多人的想像中，中国是由明确区分开的两个部分——汉民族居住的“内地”部分和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所构成的。<sup>2</sup>许多强调新疆、西藏、蒙古地区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甚至直称这些“边疆”地区为“屏藩”地区。由此可见，1930年代中国的“边疆”概念中，其实具有“边缘”与“差异”的双重含义。“边缘”也是一种临界状态，而建筑在这种“边缘”意识之上的“差异”，不仅仅是一种内外有别，而且意味着“内地”和“边疆”之间的一种主从关系：在地理上，前者为中心，后者为周边；在文化上，前者先进，后者落后；在经济上，后者应该服从于前者的利益；在国防上，后者是一个保卫前者安全的存在而已。在1930年代的国家利益至上的“边疆”意识中，中华民国实质上被想象成了一个“二重的”国家，而对“政治统一”的追求，不过是一个实现上述理想状态的手段而已。

这种“边疆”意识中的中国国家想象，令人不能不联想到多重型“天下”体制中“中华”与“四夷”之间的关系。“边疆”与英语中的 frontier、borderland 之间是否具有对应关系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中国一个极为古老的概念，<sup>3</sup>它的诞生与古代中国所想象的多重型天下中的“五服制”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关于“边疆”的传统思想，不但在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以后也没有减弱，反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得到了加强，这与当时中国受到外敌侵略、中国国民产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感之间不无关系，即使在没有直接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疆，“边疆”话语的再起也与当时日本的侵华行为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 【书讯】

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 《族体、语言与政策

### ——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5月

何俊芳 著

## 目 录

### 第一编 族体理论的构建及反思

俄国学者史禄国对“族体”诸问题的研究

古米廖夫对族体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勃罗姆列伊的族体理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对族体问题的探讨和反思

### 第二编 相关概念界定与探讨

俄语中的族类概念

俄语“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及其论争

对 ethnicity（этничность）的引进及阐释

<sup>1</sup> 最有代表性的是胡汉民的发言。关于这一点，参照胡汉民给白崇禧的信。原文载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012—3013页。

<sup>2</sup>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第4—5页。

<sup>3</sup> 一般认为，“边疆”最早出自于《左传·昭公十四年》，其中有“好於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一语。

### 第三编 语言、人口状况研究

- 苏联的民族语言教学
- 苏联的双语状况及其发展特点
- 中亚五国的语言状况
- 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文字争端
- 乌克兰的语言状况、政策及冲突
- 鞑靼斯坦的文字争端
-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语言冲突的类型及其原因分析
- 俄罗斯族人的双语问题
- 独联体国家朝鲜族的语言丢失问题
- 卡尔梅克族的历史渊源与当代境遇
- 现代卡尔梅克族的语言情势
- 苏联时期俄罗斯人的族际婚姻
- 2002 年俄罗斯联邦的民族状况
- 俄罗斯的土著小民族：人口、语言状况及国家的法律支持
- 俄罗斯的那乃人：人口结构及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 试论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认同

### 第四编 法规、政策研究

- 苏联时期的语言政策、语言改革与联盟解体
-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语言立法及其影响
- 俄罗斯联邦诸共和国的新语言政策
-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联邦的语言政策变革
- 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及实施意义
- 公民社会构建与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走向
- 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政策的实施及其意义
- 俄罗斯联邦“第二代”民族政策战略的内涵及其新动向
- 附 录：俄罗斯联邦居民的民族组成（2010 年）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33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